

「支那通」後藤朝太郎的臺灣人觀—— 以1920年《現在的臺灣》為中心

周俊宇

摘要

近代日本的中國觀，歷經了由典範到藐視的轉變。對明治維新以後走上西化之路的日本而言，中國大陸是一個擴張勢力的場域，而非以平等、尊重立場相待的對象。這個時期維繫日本社會對於中國興趣的，往往是「支那通」筆下的異國情調。本文主角後藤朝太郎便是有「支那通」之稱的一位人物。「馬關條約」以後，由中華帝國邊境社會成為日本帝國「內在支那」的臺灣，是某些統治官員或文化人士可得帝國內部之便，觀察「支那社會」、接觸「支那民族」的地方。後藤亦因曾任東京臺灣留學生宿舍高砂寮寮長之緣故，在日後以中國大陸為寫作對象而有「支那通」之譽以前，即擁有與臺灣人交遊或訪臺旅行等臺灣經驗，並有相關文字著述刊行。

本文以後藤朝太郎所撰，由東洋協會刊行，描寫臺灣當時情況的宣傳讀物《現在的臺灣》（1920年出版）為中心，綜合考察作者前後時期的論述，探討其臺灣人觀。目的在對後藤「支那民族」認識框架下對中國人及臺灣人觀察所呈現的異同，作一爬梳整理。本文首先概述近代日本中國觀的變遷，然後簡介後藤生平事蹟和其作為「支那通」的生涯、兼及其高砂寮寮長任內的臺灣經驗，以及1915年和1919年兩度的臺灣考察旅行與感想。接著，進入文本《現在的臺灣》之內容介紹，將後藤的臺灣人觀置於當時殖民地臺灣所處的內外狀況下來解讀。最後，本文探析後藤對於臺灣人的期待，以及1910、1920年代之交，臺灣知識菁英在留學生騷動中所呈現之心理變化，和其間與後藤發生的齟齬，並進一步闡述1920年代後藤執著於「支那民族」之認識方法的侷限。

關鍵詞：後藤朝太郎、東洋協會、高砂寮、支那民族、臺灣人觀

“China Hands” Asataro Goto’s View on Taiwanese: An Examination Centered on *Taiwan Today* Published in 1920

Jyun-yu Jhou*

Abstract

The attitude toward China in modern Japan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seeing China as a model to looking at China with contempt. For Japan, which had been on the road to Westernization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mainland China quickly became a field for expansion rather than a neighbor that should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During this period, what maintained Japanese society’s interest in China was often the latter’s exoticism under the pen of “*China hands*,” people who seemed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China. Asataro Goto was just such a “*China hands*.” After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Taiwan was changed from a frontier society under the Chinese Empire into an “*inner China*” under the Japanese Empire, a place where officials or cultural figures were able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a Chinese society and come in contact with Chinese ethnicity. Before he published many books centered on mainland China, thus making him a so-called “*China hands*,” Goto had extensive connections with Taiwan. He had served as the head of the Taiwanese student dormitory “*Takasago Dormitory*” in Tokyo, made friends with Taiwanese, traveled to Taiwan, and published writings related to those subject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propaganda book written by Goto, *Taiwan Today*, which was published by the Orient Association in 1920 and described Taiwan in the late 1910s. In exploring Goto’s views of the Taiwanese, the article tries to delineat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his observation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Taiwanese under a particular framework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ethnicity Chinese.” The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rticle begins by outlining the changes in modern Japan's view of China and briefly introducing Goto's life story as well as his career as a "*China Hands*." It discusses his experiences with Taiwan as the head of the "*Takasago Dormitory*" and his two research trips to Taiwan in 1915 and 1919. The article then provid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text of *Taiwan Today*, and interprets its views of the Taiwane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colonial Taiwan at that time. Finally,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Taiwanese intellectual elites at the turn of the 1910s and 1920s, their discords with Goto during the riot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okyo, and Goto's hopes for the Taiwanese. The article further considers the limitations of Goto's obsession with "Chinese ethnicity" in the 1920s.

Keywords: Asataro Goto, Orient Association, Takasago Dormitory, Chinese Ethnicity, Views of the Taiwanese

「支那通」後藤朝太郎的臺灣人觀—— 以1920年《現在的臺灣》為中心*

周俊宇**

壹、前言

明治維新後以自我保全和躋身強國為目標，走向西化的日本，在1894年日清甲午戰爭後與清朝簽訂「馬關條約」取得臺灣，邁上殖民地帝國的道路。在傳統上，中華世界的漢文化向來是日本知識界的主要典範資源，即使在西風東漸後已大失權威地位，但這個時期的統治者或文人，大多仍具備漢文素養。另一方面，在清朝統治下有大量漢人移民移入，形成漢人優勢社會的臺灣，¹ 漢文素養亦是鄉紳階層的資產。因此，日本對於臺灣的支配，在世界殖民統治史上實具特殊意

* 本文由筆者博士論文〈支那民族性というまなざし——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と台湾人認識〉（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20年）第四章翻譯改寫而成。撰寫過程中，感謝指導教授日本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若林正丈先生的諸多指導，還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新田龍希助理教授協助校閱及確認相關史料。此外，亦承蒙日本拓殖大學檔案事業室室長谷部茂教授、前室員岩口敬子女士協助提供後藤朝太郎任職該大學期間的相關資料，特誌謝忱。投稿本刊過程中，感謝匿名審查人的高見指教，方得以彌補文中許多缺陷，謹此敬表謝意。附帶說明，有關日文引文部分，筆者於翻譯時為顧及可讀性、流暢度，將在不妨害原文文意的前提下略微調整。

收稿日期：2022年6月15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8月12日。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¹ 若林正丈著，許佩賢譯，〈在諸帝國周緣活下去——臺灣史中的「邊境動力」與地域主體性〉，《師大臺灣史學報》，第9期（2016年12月），頁9-16。

義，是東亞同屬黃色人種之漢字文化圈內的政治支配，日本儘管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但與臺灣在思想或文化上共享儒教、漢字漢文等特質。²某種程度而言，原屬中華帝國邊境、前緣的臺灣，在割讓後是日本統治下唯一一處以漢人社會為主的領土，有如日本帝國的「內在支那」。³ 儒學、漢文等文化成分，特別在日治初期，的確是日臺間的共同資產，亦是日本殖民當局整合臺灣鄉紳社會的對話基礎；⁴ 另一方面，隨著統治方針或日中關係等變化，也時而與統治當局間呈現緊張關係。

成為「內在支那」的臺灣，是當時不少日本統治階層或文人得以觀察「支那」社會的環境。本文主角，戰前日本知名的「支那通」後藤朝太郎亦是其一。後藤一生當中的中國相關著作、譯著達110冊以上，受到廣泛閱讀。詳如後述，當今日本學界針對其「中國人觀」等文化論述雖有研究積累，然而儘管後藤亦有臺灣經驗，卻幾乎未有深入探討。實際上，後藤在展開撐起其「支那通」聲譽的寫作生涯前，便著有《現在的臺灣》（《現在の臺灣》，1920年）一書，就一位以「支那通」著稱的日本文化人如何看待臺灣社會和臺灣人（本文除少數例外，皆指臺灣漢人）而言，實具分析價值。職是之故，本文將針對後藤朝太郎與臺灣的因緣作一爬梳整理，並以該著為中心，參酌相關論述，考察其「臺灣人觀」，而其中又反映出何種「支那民族性」認識。本文亦要關心，這樣一個刻板的異己認識，與同時代臺人菁英自我認同的轉變間，可能出現何種摩擦，甚至是衝突？

其次，《現在的臺灣》不僅是後藤個人的著作，同時也是立場與殖民統治者相近的團體，亦即東洋協會於1920年刊行的宣傳讀物。該讀物所顯露的殖民評

²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年），頁1。

³ 有關日本語境下的「支那」一詞，根據馬場公彥的整理，相對於「中國」是中國大陸上歷代王朝、國度的自稱之一；「支那」則源自古代印度語，意同China，原是日本對於中國大陸的他稱之一，惟在帝國主義擴張時期，加深了藐視的意涵。參見馬場公彥著，林暉鈞譯，〈近代日本對中國認識中脈絡的轉換——從「支那」這個稱呼談起〉，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頁271-297。「支那」與「中國」、「中華」、「漢土」等語之間雖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本文在「支那」之語出現時，皆保持日本觀點的「他稱」立場，維持原文用法，不予代換。

⁴ 相關思想背景及過程可參見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1895-1919）〉（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年）。

價、「支那」認識，以及臺灣社會與民族的觀察，放在1910年代、1920年代之交該如何詮釋？也是本文重要研究目的。

以下，本文首先針對主題的重要背景，亦即近代日本中國觀的遞嬗與轉變略作概述，接著在介紹後藤朝太郎的生涯和臺灣經驗後，進而聚焦《現在的臺灣》之出版背景和敘述內容進行解讀分析；末尾則要對後藤的「臺灣人觀」與臺人菁英對於自我期許間之齟齬，作一對話式辯證，為本文作結。

貳、近代日本的中國觀

一、從典範到藐視

自古以來，日本就透過自中華歷代王朝傳來的漢文文學和經典，累積了深厚的中華文化認識基礎。近代以前，中華帝國的典章制度或思想學問，在日本被廣泛視為「規範之鑑」。但在由前近代轉型到近代的過程中，其規範性則僅限於道德領域，並出現了藐視同時代中華王朝的目光。⁵「支那」一稱在江戶後期的登場，初始雖稱不上藐視，惟已不具備「中華」一詞所含有的權威性，⁶在明治後更成為擺脫向來對於中華敬畏之念的一種展現。

在擺脫「中華」的動向當中，「支那民族性」的發現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甚有西洋人觀點的影響。近代日本首度刊行，引發反響的「支那民族性」相關著作，並非出自日本人自身之手，而是西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8-1932），根據自身在清朝統治下中國大陸傳教、生活的經驗，於1890年寫成之著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日譯本。十九世紀西洋人的中國觀，

⁵ 中島隆博，〈教養としての中国——規範の鑑と蔑視の間で〉，收入荊部直等編，《岩波講座日本の思想第3卷 内と外——外観と自己像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2014年），頁123-124。

⁶ 井上厚史，〈「国性爺合戦」から「漢国無体 此奴和日本」へ——江戸時代における華夷観の変容〉，《同志社国文学》，第58號（2003年3月），頁66。

整體而言是「靜止不變」或「永遠沉睡」等，這樣一個對於「非西洋」社會的印象。⁷而該書指出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有：愛面子、儉約、勤勉、守禮、無時間觀念、不精確、好誤解、粗心、缺乏公德心、肉體強韌、善忍耐、孝順、仁慈、缺乏同情心等特質，對於中國人缺點多於優點的民族性發現，不僅在西方，對於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人觀及中國人的自我認識都發揮影響，迄今仍在日本和中國持續重譯、再版。⁸日本最早是在日清戰爭後的1896年以《支那人氣質》為題由博文館出版，⁹由於戰爭擴大了與中國人的接觸，在當時被廣泛閱讀的這部著作，某種程度可謂為近代日本重整中國觀的轉換過程之際，在民族性上提供了新的著眼點。

如此仿效西洋人觀點的動向，若置於往後日本持續走上西化來看，並不難理解。回顧當時的日本，對於明治政府而言，領事裁判權和關稅自主權的恢復，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問題。1894年第一次修約，法權全面修改、稅權部分修改，並於1899年7月實施，受到修約的影響，日本必須接受外國人「內地雜居」；社會上則生出排斥外國人的情緒。在與外國人接觸、交往之需求急遽升高的同時，連帶地有許多「日本人論」問世，可謂自我、異己認識皆被頻繁意識的時期。如此，日本人一方面內化了西洋人的觀點來反省自我，同時也以西方的文明觀念，來審視較日本後進的國家或地區。¹⁰

幕末維新時期的中國觀，整體而言仍存傳統的崇敬之念。然而，日本知識分子階層的中國觀，在1840年鴉片戰爭清朝敗北時有了關鍵性的改觀，而民眾階層對於中國的侮蔑意識則是在日清戰爭後扎下根來。¹¹如此，以日清戰爭為背景，近代日本的中國觀迎向轉捩點，恰在此時吸收西洋視線而發現許多缺陷的「支那

⁷ ポール・A・コーエン（Paul A. Cohen）著，佐藤慎一譯，《知の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東京：平凡社，1988年），頁100-101。

⁸ 岩崎菜子，〈訳者あとがき〉，收入アーサー・H・スミス（Arthur H. Smith）著，石井宗皓、岩崎菜子譯，《中国人的性格》（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年），頁428-430。

⁹ Arthur H.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1890). 日譯本為アーサー・エチ・スミス著，澀江保譯，《支那人氣質》（東京：博文館，1896年）。

¹⁰ イ・ヨンスク，〈雑居への恐怖——近代日本の他者認識〉，《言語文化》，第23號（2006年），頁182-183、186。

¹¹ 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シズム——民衆の中国（人）観を例に〉，《熊本大学文学部論叢》，第78號（2003年3月），頁43-65。

民族性」，也就作為擺脫對於中華敬畏之念的方法登上論壇舞臺。

「支那民族性」在近代日本的「中國人論」中經常呈現著相似的結構。有些論著指出中國人「惟獨惡德方面不無過多之嫌。固然支那人亦有美德，縱然如此，亦不能忽視其惡德」，具體而言有「支那無國家」、「家族制度之禍害」、「實利、我利」、「自我維繫」、「面子」、「忘恩」等特徵和缺點，¹² 可知所謂「惡德」被凸顯而出。也有論著如此描述：支那民族具有「現實、現世、實利主義、商人根性」和「無知、無關心、漠然」等「支那惡」，亦有「婉曲」或「忍耐、努力」等「支那善」。只是，關於「支那惡」，常作「支那民族的處境是若不麻痺、欺瞞良心，便無法維繫其生命」，至於「支那善」亦以「動輒墮入『支那惡』傾向者不少」作結。¹³ 如此，就算承認「支那民族」亦有長處，最終仍然回歸到缺點。¹⁴

當然，日本人對於「支那民族性」之認識與中國大陸的政局變動，或日本在中國擴張勢力間的關係，無法切開來看。1912年中華民國的誕生，給日本的內政、外交帶來強大衝擊，把內田良平《支那觀》（1913年）、內藤湖南《支那論》（1914年）、《新支那論》（1924年）的思想與當時日中關係相對照便能瞭解，他們將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分離思考，認為支那民族雖無國家觀念，但擅長社會自治、歷經朝代改易亦能自我維持、外族入侵反能增強民族生命力等理解，明顯在思想上為日本介入、侵略中國提供正當化基礎。另一方面，過於拘泥民族歷

¹² 笠井孝，《裏から見た支那民族性》（東京：日本外事協會，1935年），目次頁1-3。

¹³ 山崎百治，《これが支那だ——支那民族性の科學的解析》（東京：栗田書店，1941年），頁278-282。

¹⁴ 然而，滿是缺陷的中國人負面特質，反而也能被挪用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革命家喚醒民族主義的策略上。參見坂元ひろ子，〈多民族国家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歷程——大漢族／黃種／中華民族〉，收入青木保等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解体と再構成》（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頁52-53。此外，楊瑞松亦引用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研究指出，西洋的東方主義孕含還原主義（reductionism）、本質主義的謬誤、西洋之於東方的優越性。但就清朝末期而言，這些言論體系和中國印象反被中國的知識分子援用，成為在追求共同體之際，具有權威的言論範式。這些「東方印象」不單以接受西洋印象的「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而足，這些印象由東方知識分子再生產時，其含意會發生變化，甚至顛覆原本的意義。參見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6年增訂版），頁3-4。

史或本質的認識方法，也使得這些所謂的中國專家未能正視中國，對於民族主義和愛國風潮等當前動態流於盲目。¹⁵

二、亞洲主義與異己認識

明治維新以降日本看待中國的眼光，還存在著不能以「蔑視」或「擺脫」一概論之的面向。歷來中華王朝周邊各國因漢字、儒教文化，一定程度共享文化資源，也開展了許多思想、文化的連結。如此，現今的所謂「亞洲」雖然在各個局部區域都存在著內在相近的文化圈，但作為整體的「亞洲」原本不過是西歐創造的概念，各個文化圈之間彼此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其實充滿多樣性。¹⁶ 然而，這個原本來自西方的所謂「亞洲」連帶感之一體想像，卻也反過來影響「亞洲」的知識分子，觸發他們摸索如何因應新時局的構想。¹⁷

例如在日本，這種想像就賦予處在歐美先進國和亞洲後進國、殖民地間的明治日本知識分子，一種重新評價本國優越性，起而率先領導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期待。要談論這個時期日本的亞洲認識，不能略去「國民主義」、「國粹主義」¹⁸ 和「亞洲主義」等思潮。原本「亞洲」只是誕生在歐洲的一種「空虛地理概念」，在明治日本卻政治化為一種歸屬與否的範圍認知。1880年在曾根俊虎主導下成立的興亞會，便具劃時代的象徵意義。¹⁹ 就在歐化風潮中重視日本獨特性的「國民主義」、「國粹主義」立場而言，雜誌《日本》、《日本人》最具代表

¹⁵ 相關討論參見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1981年），頁48-68。

¹⁶ 笹沼俊曉，〈アジアの中の人文学〉，收入中野目徹編，《近代日本の思想をさぐる——研究のための15の視角》（東京：吉川弘文館，2018年），頁268。

¹⁷ 例如「亞洲主義」這股思潮，就曾在戰前中國和日本的政治界、知識界間交錯，惟未能作為連帶的理念結成果實。參見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6年）。

¹⁸ 〈平民主義と国粹主義〉，收入島海靖等編，《日本近現代史事典》（東京：東京堂，1999年），頁332-333。

¹⁹ 相關討論參見三谷博，〈「アジア」概念の受容と変容——地理学から地政学へ〉，收入渡邊浩、朴忠錫編，《韓国・日本・「西洋」》（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5年），頁189-237。

性，他們為發揮日本對亞洲的主導權，集結在1891年設立的東邦協會下展開言論活動。²⁰ 其亞洲認識的框架為：（一）應承認世界各地國民、民族的文化多樣性，維持、發揚各自的「國粹」，對世界文明做出貢獻。（二）亞洲或東洋應在日本主導下聚集，向西歐國際體系形成對抗的區域秩序。²¹ 東邦協會曾在一段時期積極活動，1890年代末則由於日清戰後亞洲經驗的擴大，日本各界成立了海外教育會（1895年）、國際法學會（1897年）、東亞同文會（1898年）、南亞協會（1899年）、日印協會（1903年），以及本文將要提及的臺灣協會（1898年成立，1907年改組為東洋協會）等，在對外問題研究團體的專業分化下，東邦協會便退去共享亞洲經驗的獨占性地位。²²

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內含：（一）排除、驅逐西洋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侵略；（二）與中國、朝鮮合作，主導團結亞洲各民族；（三）實質以日本為盟主，確保對於西洋各國優越性的三個指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可以看到「小日本主義」和「大日本主義」等多樣性，對於中國也存在著歡迎國家統一或期待分裂的兩個相反性方向。只是其趨勢逐漸地向後者傾斜，甚至就亞洲整體來看，過去以東亞即日本、朝鮮、滿洲、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主義」，也在滿洲事變以後，轉換為包含廣泛亞洲範圍在內的「泛亞洲主義」。²³

擺脫處在中華世界或亞洲的劣等地位，與歐美列強並列；以及強調亞洲連帶感，彼此合作與歐美列強抗衡，兩種思維間某種程度相互矛盾。然而，就作為亞洲唯一強國的日本而言，乃能相以並存，關鍵在於日本應取中華帝國而代之，在亞洲居於主導地位。如此，縱使未達侮蔑程度，「支那民族」仍被設想成應接受「大和民族」日本人指導的位置，對於中國的軍事侵略也就被正當化成要瓦解、革新其社會體制的歷史實踐與介入邏輯。中國對於日本的存立而言，是重要的他者，日本的近代化正是透過與中國的差異化，來自我形塑的一個過程。²⁴

²⁰ 中川未來，《明治日本の国粹主義思想と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2016年），頁3。

²¹ 中川未來，《明治日本の国粹主義思想とアジア》，頁22。

²² 中川未來，《明治日本の国粹主義思想とアジア》，頁322-323。

²³ 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愛知：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年），頁33-35。

²⁴ 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

叁、日本的臺灣統治與殖民宣傳

一、作為「內在支那」的臺灣

自明鄭及清朝統治以來，隨著漢人的大量移民和文化攜入，臺灣由中華帝國的「外緣」發展為「邊境」。馬關條約簽訂後，成為日本帝國內有眾多漢人人口的殖民地，作為「內在支那」，是日本統治階層或文人得以貼近觀察或浸淫於「支那社會」的環境。例如臺灣總督府第四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在任1898-1906），任內對臺灣漢人社會的規範與習慣展開了大規模的「舊慣調查」事業。此一調查事業的立意與方式更在後藤新平於1905年就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總裁後，為滿鐵的調查事業所繼承，²⁵是日本在中國大陸勢力擴張的過程中，傳承在臺殖民經驗的一個案例。再如近代日本知名的中國專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寫下留名後世的著作《支那論》（1914年）、《新支那論》（1924年）前，亦曾短暫來臺從事報業記者工作（1897-1898），留下許多對於「支那社會」的觀察，對其日後的著述活動不無影響。²⁶

就「發現『支那民族』」這層經驗而言，臺灣人成為日本帝國內部的「支那民族」，意味著日本人得以在殖民地臺灣發現、觀察、討論「支那民族」，類似論調在殖民地臺灣各類報章文獻中亦不罕見。誠然，從臺灣人身上發現與前述同樣或類似的特性，並不意味日本知識界全然存在將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地漢人等同視之的現象，單憑「支那民族性」將近代日本對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地的漢人觀一概論之，亦非本文目的。不過，透過上述特質的發現，我們確實可以指出「支那民族性」這樣一個訴諸本質的方法，是對於兩地漢人認識上的一種連結，亦是日本人觀看臺灣人時經常使用的濾鏡。

京：藤原書店，2003年），頁141-143。

²⁵ 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国と植民地の記憶》（東京：風響社，2016年），頁43；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六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235-1259。

²⁶ 中川未來，《明治日本の国粹主義思想とアジア》，頁249-284。

二、1910年代的東洋協會與臺灣宣傳

臺灣總督府的對臺統治，在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主政下，「土匪」治安問題收束，人口、土地、舊慣各項調查展開，專賣制度建立、產業條件改善、財政獨立自主，交通網絡亦有擘畫。這些規畫方針為後任總督所繼承，在1910年代展現醒目的成果。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後期，臺灣島內的交通網絡、運輸機關趨於完善，加之生產機械化、衛生條件改善、水道和電話系統的建構等，伴隨而來的是生活水準提昇，還有教育機會的擴充。²⁷

另一方面，日治初期「土匪」、「生蕃」等「治安」問題給在臺統治帶來莫大挑戰。有些見解認為治臺初期有「臺灣三禍難」之稱其一的「土匪」，乃緣自「支那民族性」，這在不少統治階層或知識分子身上皆可看到。將視野轉往日本本國社會，由於「土匪」經常和另一禍害「生蕃」作為野蠻印象同在大眾媒體出現，兩者容或發生了交混，或將「治安」問題全部歸因於「生蕃」的現象。²⁸即便1910年代除了是日本在臺殖民統治展現成果，同時也是透過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二十世紀躋身帝國主義列強之列，國民意識茁壯成長的時期。然而，內涵複雜的「野蠻之地」印象，似乎一直到在臺殖民統治收致成果的1910年代，也無法自日本內地的臺灣觀拂拭而去（詳如後述）。

本文要探討的《現在的臺灣》是由東洋協會以日本本國讀者為主要對象刊行，²⁹描繪1910年代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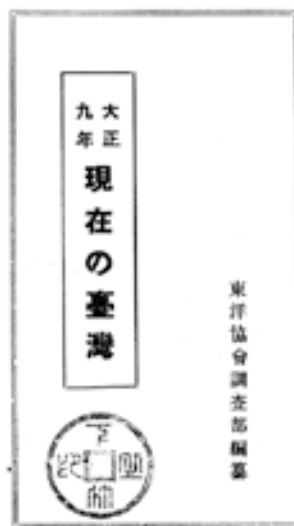


圖1、《東洋時報》別冊
《大正九年 現在の
臺灣》書名頁

資料來源：翻製自日本拓殖大學檔案事業室所藏數位資料，無檔號。

²⁷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臺北：鴻儒堂，2003年），頁70-83、101。

²⁸ 周俊宇，〈日本統治下對於臺灣「土匪」的民族性認識〉，《臺灣風物》，第70卷第3期（2020年9月），頁21-65。

²⁹ 〈臺灣協會規約〉，《臺灣協會會報》，創刊號（東京，1898年10月），頁3。

半臺灣的一本宣傳讀物（參見圖1）。東洋協會的前身即臺灣協會，是在日本領有臺灣未久的1898年，在曾任官員等涉臺人士主導下成立的團體，一直到1907年改組為東洋協會為止。這個團體自許要向日本內地傳遞臺灣消息、在臺實施實業調查、監督輔助留日學生。其中影響尤大者為《臺灣協會會報》之發行，³⁰ 以及臺灣協會學校（現拓殖大學）的創立。³¹ 1903年大阪舉辦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時，該協會就透過發行觀光導覽和設置臺灣會館等，協助臺灣人往赴日本觀光，業務項目多元。³²

日俄戰爭後，臺灣協會的事業重心由臺灣轉移至朝鮮半島、滿洲，並更名為東洋協會，揭舉：（一）「關於臺灣、朝鮮、滿洲、支那等東洋各國的學術、經濟調查」。（二）「培育可在各殖民地和海外從事公私業務的殖民人材」。（三）「宣揚東洋文化、振興殖民思想及普及海外相關智識」。（四）「蒐集東洋相關研究資料、設立可供典藏和參觀的圖書館及拓殖館」等，以襄助日本帝國發展的事業為目標。³³

東洋協會的出版事業以《東洋時報》、《東洋》的刊物類為主，³⁴《現在的臺灣》則是該會少數出版之單行讀物的第一冊。該書先作為《東洋時報》特輯讀物在1920年7月刊行，同時由白水社進行一般發行，以「廣泛向一般社會介紹臺灣實際狀況」。該書凡例說明此次出版屬「倉促發想、初次嘗試，內容和體裁不足之處甚多」，終是「為向內地人普遍介紹臺灣現狀，除內地人向來誤解事項外，也為日後來臺遊歷，或有事業計畫人士而編纂的一冊指引」。該書內容是

³⁰ 上沼八郎，〈台灣協會會報解題「台灣協會とその活動」〉，收入《台灣協會會報》，別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88年複製版），頁3-69。

³¹ 〈臺灣協會學校設立認可〉，《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稱《臺日》），臺北（以下省略），1900年7月10日，版2；〈臺灣協會學校の始業〉，《臺日》，1900年9月29日，版2。

³² 〈臺灣協會と博覽會〉，《讀賣新聞》，東京，1902年4月30日，版2；〈臺灣協會と博覽會〉，《臺日》，1902年5月8日，版2；〈臺灣協會と博覽會〉，《臺日》，1902年5月11日，版2。

³³ 〈東洋協會趣意書〉、〈規約〉，《東洋時報》，第101號（1907年2月），序言頁2。

³⁴ 吳宏明針對兩協會的機關刊物所見的「臺灣認識」已有研究。參見吳宏明，〈近代日本の台湾認識——『台灣協會會報』・『東洋時報』を中心に〉，收入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東京：綠蔭書房，1996年），頁211-241。

「涵蓋臺灣居民風習、思想、教育、宗教、或產業狀態、金融交通等各方面」的概述。³⁵ 由此可知，東洋協會在面向日本內地之臺灣宣傳事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現在的臺灣》在上述期待下發刊的背景。

下面將要介紹《現在的臺灣》作者，時任東洋協會主事兼拓殖大學教授後藤朝太郎享「支那通」之譽的生涯和業績，及其臺灣經驗。接著再以該書內容和作者其他活動和言論為分析對象，探討後藤顯現的臺灣人觀為何，與當時臺灣知識菁英正在摸索自身理想姿態的追求行動間，又存在何種矛盾和齟齬？

肆、「支那通」後藤朝太郎的臺灣經驗

一、生涯與評價

後藤朝太郎，號石農，1881年4月16日出生於愛媛縣，本籍為廣島縣。他在熊本縣的第五高等學校畢業後，1903年9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言語學科就讀。在學時他翻譯、出版了馬克斯·繆勒（Muler Friedrich Max）的《語言學》，年少得名。1907年7月大學畢業時的論文題目為〈支那古韻K·T·P的沿革與由來〉（〈支那古韻K·T·Pの沿革と由来〉）。後藤在畢業後同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部，繼續研究語言學，並有7冊著作問世。³⁶ 根據拓殖大學所藏，後藤本人於1922年親筆手寫的履歷文件可知，後藤是以「第一回特選給費生」的身分，在東京帝大深造了兩年。其後他於1911年7月任文部省國語調查囑託，1912年9月任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補助委員，1914年9月起任臺灣總督府高砂寮寮長囑託七年，1919年12月任朝鮮總督府學生監督囑託，1920年6月任東洋協

³⁵ 〈凡例〉，東洋協會調查部編纂，《大正九年 現在の臺灣》（東京：東洋協會，1920年），頁9-10。該書封面載有「東洋時報第二百六十三號」，經查前後刊次，可知該書並非《東洋時報》第263號。參酌《東洋時報》第262號缺刊的情況可知，該書似乎至少是作為《東洋時報》的別冊，取代《東洋時報》第262號刊行的讀物。

³⁶ 劉家鑫，〈「支那通」後藤朝太郎の中国認識〉，《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4號（1997年3月），頁95。

會所屬拓殖大學教授，1922年9月任東洋協會大學教授。有趣的是，後藤在這份履歷書裡特別寫下自己旅行臺灣、滿洲、支那等地多次，強調自身的遊歷。³⁷由拓殖大學的校史出版品可知，後藤朝太郎早期（1920年4月至1923年3月）負責講授的科目是「支那事情」。³⁸再據1939年版的日本名士錄《人事興信錄》內所收〈後藤朝太郎〉詞條，上頭記載後藤是日本大學教授，並在多所學校兼任，還於多個團體、組織擔任理事或評議員，以著述為業。文中介紹他曾歷任文部省、朝鮮和臺灣各總督府囑託，著述興趣遍及支那文化、語言、風土、民俗等各方面，還介紹後藤遊歷支那、滿洲、南洋達五十多次，以「支那通」著稱。³⁹由於該詞條未將其在東洋協會所屬大學的職務列為主要經歷，目前無法確知後藤在東洋協會體系任職的詳細期間，不過在本文範圍的1910年代和1920年代之交，後藤在職務上和臺灣總督府、東洋協會、高砂寮等涉臺相關機構有確切連結，則無疑問。



圖2、後藤朝太郎履歷文件

資料來源：翻製自日本拓殖大學檔案事業室所藏數位資料，無檔號。

³⁷ 〈後藤朝太郎履歷書〉，1922年10月30日，日本拓殖大學檔案事業室（拓殖大学アーカイブズ事業室）典藏，無檔號。

³⁸ 渡邊利夫主編，《拓殖大学百年史 昭和前編》（東京：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委員會，2011年），頁195。

³⁹ 〈後藤朝太郎〉，收入人事興信所編，《人事興信錄》，上卷（東京：人事興信所，1939年版），頁109。

後藤朝太郎死於日本宣布投降前不久的1945年8月9日，有說法指出他是由於同情中國民眾和反對軍部作為，而遭到右翼人士佯裝交通事故暗殺。⁴⁰

中國史學者三石善吉將其生涯活動區分為三期：第一期為1907年到1917年左右，少壯「支那語文」學者之時期；第二期為1918年到1926年左右，由語言文字學轉而重視社會生活提倡「新支那學」之時期；第三期是1927年到1945年間，接續出版了淺顯介紹中國行旅遊記與文化論述之時期。⁴¹ 對此，同樣研究後藤朝太郎的劉家鑫又追加1903年到1907年間，即以學生身分打下語言學基礎的時期，共為四期。⁴²

後藤在東京帝國大學時專攻「支那語言文字學」並有研究成果，但回顧其生涯業績，著作雖達110冊以上，惟以隨筆、啟蒙讀物、時勢演講為多，學術研究不過5冊。⁴³ 不過，從大正時期到戰爭結束前，他旅行中國大陸達50次以上，這使得他重視「支那民族」的文化心理，更甚於「支那語」的文字學和音韻學。他介紹中國風土民情的著作也被當作是「支那趣味」的讀物而受到歡迎，被稱作「支那通」第一人。⁴⁴ 他親近中國風土民情最具特徵的方法，就是重視在地觀察、關心下層民眾，而非上層階級的文獻學



圖3、作中國風打扮的後藤朝太郎

資料來源：翻製自氏著，《支那民情を語る》，彩圖頁1。

⁴⁰ 三石善吉，〈後藤朝太郎〉，《現代日本朝日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0年），頁664-665。

⁴¹ 三石善吉，〈後藤朝太郎と井上紅梅〉，收入竹內好、橋川文三編著，《近代日本と中国》，下卷（東京：朝日新聞社，1974年），頁29-35。

⁴² 劉家鑫，〈「支那通」後藤朝太郎の中国認識〉，《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4號，頁97。

⁴³ 石川泰成，〈後藤朝太郎の支那学の構想〉，《九州産業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第19號（2001年8月），頁3。

⁴⁴ 呂慧君，〈「老上海」内山完造と「支那通」後藤朝太郎の中国認識〉，《日本文芸研究》，第64卷第2號（2013年3月），頁77-78。

研究。⁴⁵ 實際上，後藤在中國旅行、停留、探訪，甚至是在日本外出時，經常穿著中國式服裝（參見圖3）、住一般旅宿、吃相同餐食，佯裝成中國人，藉此深入中國社會，理解中國人的心理。

在日清、日俄戰爭以後，日本政界和學術界、知識界輕視中國，許多研究則指出後藤朝太郎反對藐視中國，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民眾抱持親近感。⁴⁶ 在討論戰前中國文化和時局的統治官員和知識分子當中，後藤正視中國人為一認識對象，充分尊重中國人的優點，並探索共存之道的一面。⁴⁷ 有學者評價後藤朝太郎是「身體各處皆有人文精神脈動」的罕見文化學者，給予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又有研究指出後藤的認識框架終究難褪日本人立場，因為後藤認為中國「不會變化」，不給予中國革命運動太高評價。其中國觀雖有社會觀和民眾觀，卻無完整的國家觀，中國的民族主義或近代國家的形成未能在其論述視野登場。⁴⁸ 日本出兵山東和滿洲事變之際，他不畏懼地譴責日本當局和軍部的暴走，但在日中戰爭後其立場則偏向日方。⁴⁹ 他對於國家總體戰採取配合態度，呼籲日本的統治者階級應該關注中國的下層民眾，掌握民心、尋求與良民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以認同日本為大東亞領導國的人才是「良民」，期望能在汪精衛政權主導下實現和平。⁵⁰ 不過，一旦認識到國民政府堅定的抗日態度後，又對日本的武力侵略轉為否定，強調中日應共存，要重建和平等。⁵¹ 由上可知，後藤雖然關心中國，但若涉及日本對於中國的角色，亦順應時勢有所變化，未必抱持前後一貫的立場或中

⁴⁵ 石川泰成，〈後藤朝太郎の支那学の構想〉，《九州産業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第19號，頁16。

⁴⁶ 劉家鑫、李芯，〈「支那通」の中国認識の性格——後藤朝太郎と長野朗を中心に〉，《東洋史苑》，第70、71號（2008年3月），頁36。

⁴⁷ 劉家鑫，〈「支那通」後藤朝太郎の中国認識〉，《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4號，頁95。

⁴⁸ 劉家鑫，〈「支那通」後藤朝太郎の中国認識〉，《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4號，頁38-39、42。

⁴⁹ 劉家鑫，〈後藤朝太郎の日中關係論——山東出兵から日中事変まで〉，《現代社会文化研究》，第11號（1998年3月），頁1-27。

⁵⁰ 呂慧君，〈「老上海」内山完造と「支那通」後藤朝太郎の中国認識〉，《日本文芸研究》，第64卷第2號（2013年3月），頁84-85。

⁵¹ 劉家鑫、李芯，〈「支那通」の中国認識の性格——後藤朝太郎と長野朗を中心に〉，《東洋史苑》，第70、71號，頁47-49。

心思想。

後藤朝太郎雖留下龐大著述，惟其在學術上的評價絕不算高。「支那通」一稱原本已含侮蔑之意，因為大正時代的日本重視歐美文化，中國相關知識不受平等相待，「支那通」僅在介紹人文民情，例如鴉片、人身買賣、賣春等風土異聞，勉強維繫民眾對於中國的興趣和獵奇幻想。⁵² 只是，這些存在偏向的介紹，由於缺乏學術性、客觀性，容易形成膚淺偏見，反而妨害深入認識中國的可能性。後藤的「支那通」稱號是建立在其龐大著述數量上，三石善吉認為這能夠體現其在日本藐視中國的風潮中，從特立獨行、走近觀察到為文著述的「反骨精神」，給予正面評價。然而，其反覆粗製濫造淺顯的中國觀，輕視中國的當前變化，反而助長了日本民眾對於中國的輕蔑，此一負面影響則屬否定評價。⁵³ 三石善吉這段總評可謂替圍繞著後藤看似針鋒相對的正反看法，做了一個妥切的詮釋。

後藤朝太郎作為「支那通」的評價某種程度已有定評，惟論及其對於「支那民族」的關注，即使他留下不少觀察臺灣人的敘述，迄今研究縱有些許提及，如非聊為點綴，⁵⁴ 便是與其「中國人觀」一概而論。⁵⁵ 然而，後藤的「臺灣人觀」即使囿於「支那」這套框架，卻是經常意識到與「支那」本地的民族，也就是中國人的比較，在探討時宜加以區別。

⁵²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1981年），頁80；石川泰成，〈後藤朝太郎の支那学の構想〉，《九州産業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第19號，頁1。

⁵³ 參見三石善吉，〈後藤朝太郎と井上紅梅〉，收入竹内好、橋川文三編著，《近代日本と中国》，下卷，頁28-35。

⁵⁴ 如相田洋，〈タフで骨太な民間シナ学研究家——後藤朝太郎〉，收入氏著，《シナに魅せられた人々——シナ通列伝》（東京：研文出版，2014年），頁10-117。

⁵⁵ 例如石川泰成的研究指出：「後藤朝太郎在大正3年接受臺灣總督府的依囑，監督、照料中國人留學生，也同樣依臺灣總督府的依囑在臺灣當地進行考察，接觸到了現實的中國」。參見石川泰成，〈後藤朝太郎の日中民族性比較論——ある支那通の日本人批判〉，《九州産業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第22號（2002年8月），頁48。

二、高砂寮寮長經歷與訪臺之行

迄今關於後藤朝太郎的既有研究，不太關注他與臺灣的連結，但他在產出日後譽為「支那通」的業績前，曾在高砂寮擔任寮長七年，這段經驗是他與臺灣的一道重要連結。高砂寮是臺灣總督府為收容、保護、指導、監督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於1910年設置在東洋協會專門學校（東京小石川區茗荷谷町32番地）內，並委託東洋協會經營的設施，⁵⁶ 與臺灣留學生關係密切。⁵⁷ 處在臺灣總督府監督、管理下的留學生，如無廳長、支廳長證明文件，或臺灣學生監督所介紹文件，便無法進入日本內地學校就讀。⁵⁸ 東洋協會自臺灣協會時期起就承接留學生的輔導工作，至1928年高砂寮新建落成，其經營讓渡給學租財團才結束。至於留學生整體的監督工作，原本是由總督府在高砂寮設置事務處辦理，1914年由東洋協會承接該事務。⁵⁹

後藤由於臺灣總督府和東洋協會的這層關係而擔任高砂寮寮長。因此，他雖然以日本內地為主要活動據點，仍透過與在京臺人留學生的交流，以及訪臺視察之旅同留學子弟家長接觸等，自負擁有較統治當局和一般內地、在臺日人政界、社會不同觀點的臺灣人觀。正因有上述立場和自負，後藤才會在1910年代後半到1920年代間，透過著述活動提倡應多加理解臺灣人。他以長年來對支那的強烈關心為基礎，在詳如後述之《現在的臺灣》，以及其他評論和遊記等作品中，呈現臺灣與「支那民族」發源地，即中國大陸的比較，可謂展現出了一位「支那通」的臺灣人觀。

（一）1915年的訪察與感想

1915年後藤以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員身分，與東洋協會參事久門高行、同

⁵⁶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臺灣の教育》（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4年），頁104；加藤春城，《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1939年），頁76-77。

⁵⁷ 參見紀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研究》（東京：龍溪書舍，2012年），第三章。

⁵⁸ 〈高砂寮の近況 本島人の東京留學生は何んな生活をして居る〉，《臺日》，1915年4月20日，版3。

⁵⁹ 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台湾・東洋協會研究》（東京：拓殖大學，2011年），頁98-100。

為學術調查部員的龜山富作一同在訪視調查名義下訪臺。一行人在7月28日抵達臺灣，從基隆、臺北、新竹沿西部向南行，再經東部北上。在長達兩個月的旅程中，他參訪、考察各地設施，也和日籍官員、教育界人士，以及臺人士紳、在京留學生的家長會面、交流。⁶⁰ 後藤將這趟臺灣訪察之旅彙整為文字，以〈臺灣所感〉為題，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

後藤在這一系列的〈臺灣所感〉當中，有一部分討論了「本島人」，也就是臺灣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他謂在日本的「內地人」並不特別在意「本島人」的言行舉止，但自己在臺演講時，「總督府方面人員」必定會注意在場「本島人」的舉動。整體而言，在臺「內地人」和「總督府方面人員」對「本島土民」抱持超乎必要的警戒，令人感到過於神經質。其次，他也點出臺灣人的心境，描述「臺灣人方面或許也未如吾等內地人所以為的那般對我開誠佈公。即使是領臺二十年後的今天，甯論同化，不管何事似乎皆未達到足以安心的程度」。但「本島人」對於來自內地的自己反而能敞開心胸，侃侃而談。那是因為自己「平時擔負留學內地臺灣學生指導監督之責，多少由於受到各家託付子弟之故，才得以融洽，……我感覺並未有總督府人員所憂心程度般秘密主義人物。」⁶¹

有關「本島人」的性情，他指出在短暫停留臺灣期間，會見了名望家、商人、農民、學者等眾多人士，有時進入他們的家庭一同起居，隨行上山，進出「蕃界」，所以很能瞭解情況。在臺「內地人」總說：「生蕃人最為直率，惟有時不能輕忽大意，就此而言，熟蕃比較安全」，「而支那人種即臺灣人的陰險難待，我亦素有耳聞」。

然而，這廂溫暖交流相待，針對其盼望或為難之處，敞開心胸而談，可知彼等似乎並非如此奸惡狡滑之人。尤其這次在臺南廳內發生的土匪滋擾事件（按：應指西來庵事件）雖無疑為重大問題，惟此事毋寧是其首魁人物之二三匪賊，無所事事煽動愚民而發起者，似乎未有一般土人對

⁶⁰ 如〈在京留學生近況 後藤朝太郎氏談〉，《臺日》，1915年7月29日，版7；〈後藤氏一行如行〉，《臺日》，1915年8月7日，版6；〈學士來嘉〉，《臺日》，1915年8月27日，版6；〈後藤學士遊宜蘭〉，《臺日》，1915年9月20日，版4。

⁶¹ 後藤朝太郎述，〈臺灣所感（一）〉，《臺日》，1915年12月11日，版4。

內地人懷有嫌惡情感般的嚴重意圖。⁶²

至於「本島人」的生活，後藤與上、中、下各階層人們接觸的感想是：「本島人」和「內地人」不同，具有能夠滿足極其低度生活的通性。在日本人眼裡，會苦於揣測他們究竟如何看待日常生活？此點和支那的「土人」無甚差別，「支那人」就算過著低水平的生活，仍較日本人更愉快地過著每一天。東洋有謂：「安於清貧」，「支那人」和「本島人」正是其體現云云。⁶³

另一方面，針對「本島人」蓄財的目的，後藤認為他們較「內地人」更有餘裕地從容過活，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本島「土民」的生活程度屬中等以下，令人意外的是，耗費在婚喪喜慶、年節活動的費用較生活所需還多。娶妻是成為成熟男人的必要條件，須為結婚籌錢。「本島人」在捐款上也更為踴躍，乃「內地人」所不及。⁶⁴

與此相關，有關「本島人」埋藏財貨的習慣，後藤描述：就算看起來只是小佃農程度，也有30萬至50萬日圓的資產。「本島人」極度秉持質樸態度，並視為尋常普通之事，此乃內地富豪終究無法模仿。此種習慣是為防範「土匪」的滋擾而有，現今縱使不如過去般發生「土匪」滋擾，但仍墨守二十年前的舊慣，外觀上令人感覺苦悶，其心底卻是泰然自得。⁶⁵ 由於無法推知後藤的訊息來源，不能逕行評斷其認知之對錯，惟就該讀物的宣傳性質而言，後藤對於臺灣社會底層的描述，不難想像或有溢美之辭，其用意就在凸顯「埋藏財貨」這個民族特質。

然而，後藤認為臺灣的進步成果未能在內地普遍宣傳，因此東京方面對臺灣仍停留在「蠻荒之地」的印象，頂多只知道這裡出產砂糖和木材，整體而言對「本島人」不甚抱同情之念。來臺的「內地人」向以九州出身的移民為多，除勞工界外，也有知識階層人口移居，但知識階層不以來臺為榮，而是囿於地域成見，嫌忌移居。臺灣在二十年來已有長足進步，某些方面乃內地所不能及；後藤

⁶² 後藤朝太郎述，〈臺灣所感（一）〉，《臺日》，1915年12月11日，版4。

⁶³ 後藤朝太郎述，〈臺灣所感（二）〉，《臺日》，1915年12月12日，版4。

⁶⁴ 後藤朝太郎述，〈臺灣所感（二）〉，《臺日》，1915年12月12日，版4。

⁶⁵ 後藤朝太郎述，〈臺灣所感（三）〉，《臺日》，1915年12月16日，版4。

又述在臺內地兒童的教育則令人不能卒睹，常見臺語和「生蕃語」的混用。⁶⁶ 顯現其對於在臺「內地人」的「灣化」似有焦慮。

（二）1919年的訪察

1919年夏天，後藤朝太郎復來臺訪察，目的是為留學生有「不少品行不修、行為怠惰、學力低劣者」，須與其「父兄會談，以資將來充分飭戒」之故。⁶⁷ 詳情在文字中雖未述明，惟此時乃臺灣在京留學生中出現「六三法撤廢運動」等政治動向之時期，恐為事由背景。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後藤在8月1日由內務局學務課屬松島音次郎陪同由臺北出發，將由宜蘭廳巡迴各廳，行程至9月上旬許。⁶⁸ 每日行程未詳，根據報載，他於8月3日在宜蘭與留學生家長及當地官員會面。⁶⁹ 8月16日在臺南與返鄉的留學生和留學生家長會見，針對留學生狀況進行懇談和演講。⁷⁰ 8月21日抵達臺中，在阿罩霧庄的林家（霧峰林家）停留一晚後，22日前往葫蘆墩街（現豐原），23日再度回到臺中，於某俱樂部進行演講。⁷¹ 9月3日返回臺北，在內務局學務課向代理課長野口敏治報告訪察概況，隔天（4日）從基隆搭乘輪船「備後丸」回到內地。⁷²

這趟長約一個月的訪察，是以與留學生家長會面和演講等活動為主，僅就《臺灣日日新報》上所見，後藤針對臺灣人的具體敘述很少。惟此趟訪察之旅的觀察應該也反映在1920年出版的《現在的臺灣》裡。

⁶⁶ 後藤朝太郎述，〈臺灣所感（四）〉，《臺日》，1915年12月17日，版4。

⁶⁷ 後藤朝太郎談，〈高砂寮近況〉，《臺日》，1919年9月30日，版7。

⁶⁸ 〈留學生の家庭を訪問す 後藤寮長の來臺〉，《臺日》，1919年8月1日，版2。

⁶⁹ 〈後藤高砂寮長來宜〉，《臺日》，1919年8月15日，版4。

⁷⁰ 〈後藤寮長講演〉，《臺日》，1919年8月17日，版4。

⁷¹ 〈後藤氏の來中〉，《臺日》，1919年8月25日，版6。

⁷² 〈後藤氏の報 本島留學生家庭狀況〉，《臺日》，1919年9月4日，版2。

伍、《現在的臺灣》內容分析

一、發行目的

1920年7月《現在的臺灣》出版（參見圖4）。⁷³ 本書不單是後藤個人的著述，亦是東洋協會調查部出版事業的一環。關於《現在的臺灣》出版目的，東洋協會專務理事永田秀次郎和後藤本人收錄於該書的序文有所說明。⁷⁴

首先，永田詳細寫下了出版背景，茲摘要如下。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躋身強國之列，卻遭到世界的妒視和誤解，被誣陷為軍國主義、好戰國民、白色人種的威脅者等，國際地位其實艱難。

然而，日本人是愛好、重視和平與正義的民族，

用兵也是帝國自衛起見而不得已的處置。即使曝

露於如此誤解之下，日本國民仍有兩項高尚的使命，那就是宣揚東亞文明，與泰西文明融合以貢

獻於人類生活；以及主張人種之間並無差別。冷靜自省，日本人至今對歐美人仍敬愛卑屈，但對於東亞同種其他國家的人民卻是自傲且侮蔑，這樣的現況實不樂見。認識東亞各民族、宣揚東洋文明，必須從掌握、了解東洋各地的情況來著手。東洋協會設立的旨趣之一，正是為了促進東亞文化的發展，融合各民族。因此協會設置宣傳部，透過演講、文字、動態照片（即「活動寫真」）來傳遞東亞消息，本書即為該計畫的一環。臺灣自領有以來已有二十五年，臺灣情況卻不太被日本本國的「內地人」知曉，令人驚訝。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內地人」常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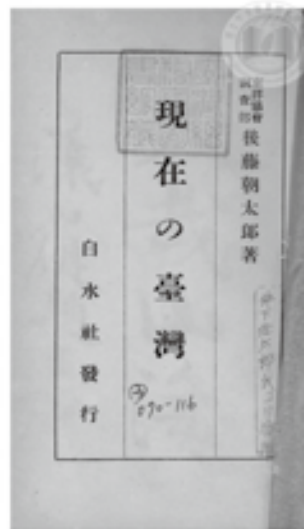


圖4、《現在的臺灣》書名頁

資料來源：翻製自國立臺灣圖書館藏書。

⁷³ 以下引述皆根據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東京：白水社，1920年）。

⁷⁴ 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台灣・東洋協會研究》，頁180-181。下一段落引述皆根據永田秀次郎，〈序〉，收入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8。

法區別臺灣人和「生蕃人」。這是「內地人」「漫不經心」，且臺灣統治當局「未努力宣傳」之罪。有關後者，總督府「偶為宣傳，卻在博覽會上誇張地介紹生蕃，反傳遞不良印象予「內地人」之愚，此皆不共同深戒不可也」⁷⁵。文末永田自許協會的宣傳自臺灣始，未來亦將周及朝鮮、滿蒙、支那等東洋各地。

接著，後藤在自序中談到：為臺灣感到驕傲的臺灣人並不多，儘管臺灣人足以自豪的事不少，卻未廣泛周知於內地。臺灣有值得誇耀的文化、壯闊的山水、健全的基礎設施、發達的產業，遙遙領先世界上的其他殖民地，「在居民裡有本島人這樣一支在東亞漢民族中開化程度最高的三百萬以上之灣人（按：原文如此）存在」一事，幾乎都未向內地宣揚。因此宣傳臺灣現狀是當前要務。

那麼，為何是由後藤撰寫本書？他謂：「本人素非臺灣通，只是個半調子。自己不過是有較多接觸身處內地六百多名臺灣青年的機會，巡遊臺灣時也能得到如訪問家庭和與家長面談等許多方便。」並且，「自己總會與支那慘酷的現狀比較來思考。如此一來，臺灣便更添光彩，叫人在心情上不禁為臺灣感到驕傲。所思所想惟有多談臺灣，邀請「內地人」往南方去，引領他們航向南國的樂土。」由此可知後藤用意不僅在於向內地的日本人宣傳臺灣情況，也旨在向世界宣傳日本統治臺灣的成果。⁷⁶

二、「善意」的臺灣人觀

針對臺灣人，後藤展現出怎麼樣的認識呢？表1為《現在的臺灣》一書的章節架構，該書整體述及臺灣人觀的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九章全數和第十章、第十一章的部分內容。後藤認為臺灣人有許多優點，本文無法一一詳述，將擇要引述、討論其內容與背景。書中描述臺灣漢人時，「漢」和「支那」兩種

⁷⁵ 有關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詳情，參見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博覽會上實際一起展示了臺灣的「支那人」、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臺灣的「生蕃」、琉球人、朝鮮人等人種。這樣的展示方法給在東京中國人留學生等帶來了遭受「歧視主義目光」的衝擊、羞辱印象。參見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頁68-75。

⁷⁶ 後藤朝太郎，〈序〉，收入氏著，《現在の臺灣》，〈序〉頁1-4。

稱法皆有所使用，本文原則上皆按原文呈現。此外，該書亦有關於臺灣原住民的敘述，惟本文將聚焦於臺灣漢人，故予以割愛。

表1、《現在的臺灣》目次

第一章 臺灣的今昔*	一 當今內地人所以為的臺灣是往昔臺灣／二 臺灣人的困擾／三 今日臺灣在某些方面是東洋第一／四 內地人的漫不經心
第二章 臺灣居民的風習*	一 臺灣的居民／二 臺灣人的服裝／三 臺灣人的住宅／四 臺灣人的餐食／五 臺灣人的性質／六 臺灣的女子與家庭／七 臺灣人的嗜好／八 蕃人的風習
第三章 臺灣的進步*	一 臺灣與中華民國在生活上的比較／二 臺灣的社會狀態／三 臺灣的衛生狀態／四 臺灣的經濟狀態／五 臺灣人不平的片面／六 臺灣人的向學心
第四章 臺灣的行政與財政	一 總督府／二 地方十二廳／三 特設機關／四 歲計及租稅
第五章 臺灣的產業	一 臺灣特產之歌／二 臺灣的農業／三 臺灣的林業／四 臺灣的水產／五 臺灣的礦業／六 臺灣的工業與製糖公司／七 臺灣的四種專賣事業——鴉片 樟腦 食鹽 菸草
第六章 臺灣的珍物	一 珍奇的自然／二 珍奇的動物／三 珍奇的植物
第七章 臺灣的金融	一 貨幣／二 銀行／三 信用組合／四 互助會與當舖
第八章 臺灣的交通	一 命令航路／二 築港／三 道路／四 鐵路／五 私設軌道「小火車」／六 郵務、電信、電話
第九章 臺灣的教育*	一 新式教育／二 舊式教育／三 圖書館與博物館／四 內地留學生／五 教員講習會與臺灣教育會／六 世界上罕見的蕃人通學狀態
第十章 臺灣的宗教*	一 臺灣也設置了烏居／二 始自領臺以前的宗教／三 領臺後傳入的宗教
第十一章 臺灣與南支南洋*	一 臺灣與南支那／二 臺灣與南洋
第十二章 臺灣渡航須知	一 渡航的海上／二 遊覽臺灣島內名勝
附 臺灣旅行用地圖	

資料說明：目次頁和正文各章節標題部分偶有些微出入，此處根據前者。論及臺灣人觀的章節加上*。

（一）呼籲日本人重新認識臺灣

後藤在第一章向日本人呼籲應重新認識臺灣。他首先指出「內地人」所認知的臺灣是過去的臺灣，且批評領臺後經過了二十多年，「內地人」對臺灣仍然冷淡且缺乏理解，瞭解臺灣的人極其少數。一提到臺灣，至今仍有人聯想到「生蕃」，但「臺灣新附同胞」大多數是「漢民族」，「漢民族」的文化程度與「內地人」相差不大，透過教育的普及或「留學」內地更顯進步。在內地留學的臺灣學生，容貌、服裝、動作等亦與內地學生無異。一提到臺灣，也有人聯想到瘧疾和黑死病等疾病，但臺灣的衛生狀態極為進步，今日臺灣是南方樂土，與領臺前相較，判若雪泥。日本人不應該拘泥於過去「小日本」的島人根性，而應自覺「大日本」的高尚及偉大使命，呼籲不該輕蔑臺灣人、朝鮮人或鄰國的中華民國人。⁷⁷ 接著，後藤呼籲「內地人」應留意的一個重點是「對於臺灣新附同胞」的用語問題。這個段落以臺灣漢人為中心立論，指出「內地人」對臺灣人經常使用「臺灣土人」之語，但這會使人與文化程度較低的野蠻人即「生蕃人」作聯想，應該避免。⁷⁸ 例如，在京臺灣人常被學校、住宿居所，以及大眾媒體誤認是「生蕃」，或是文明進步的「熟蕃」，這其實造成頗大困擾。⁷⁹ 再如「臺灣人」與「日本人」之區別方式，常令「臺灣同胞」不愉快，因為臺灣同胞亦是「日本國民」、「陛下赤子」。是以不如用「內地人」、「臺灣人」分之；但臺灣同胞亦不喜「臺灣人」之稱，這時則以「內地人」、「本島人」為別。⁸⁰ 這似乎也意味著後藤本身認知臺灣漢人較偏好「本島人」這個稱呼，而書中對於臺灣漢人的稱呼則「臺灣人」、「本島人」摻雜。

然後，後藤舉出臺灣的氣候和環境也遭「內地人」嫌棄，諸如「颱風」發生地、「劣質臺灣米」、「臺灣藝妓」、「自臺灣歸來的人」等形容，皆是為了更有趣地傳遞臺灣消息，只列舉令人不快的事例導致。若對照到臺灣二十多年來已有長足進步，坐擁多數文明設施，號稱東洋第一的實情，「吾人實為臺灣感到遺

⁷⁷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4。

⁷⁸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4。

⁷⁹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2-14。

⁸⁰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4-5。

憾不堪」，主張今後應多加宣傳。⁸¹不少「內地人」會只因曾在臺灣待過就自覺卑下。然而，縱使臺灣起初的確處於無法安居之條件，如今已有天壤之別。這裡不僅城市進步，農村的灌溉和運輸等設施也同樣發達，堪稱東洋第一者甚多，他呼籲應對臺灣文明的進步抱持自信，感到自傲。⁸²

在第一章末尾，他主張今後應加強臺灣的宣傳。臺灣的宣傳工作在時任總督田健治郎和總務長官下村宏主政下著實推動，惟一直以來的宣傳手法謬誤甚多，如「生蕃」內地觀光團和博覽會中臺灣館的宣傳手法等，皆是大大錯誤。他批評這樣只會讓人聯想到「殘忍」或有不良影響。⁸³對於總督府為宣傳政績而放映的「動態照片」，後藤則認為應在內地多加推廣，以周知臺灣的文明現況，本書的發行亦欲收此推波助瀾之效。⁸⁴由上述可知，後藤出於自身訪察旅行和擔任高砂寮長的經驗，認為日本內地常見的臺灣印象存在不少謬誤，故擬具體陳述臺灣的實際狀態和問題，導正內地對臺灣的印象，並加以宣傳。

（二）民族性格的認識

該書第二章由宗教和食物等多方面來陳述臺灣人的風習，也有不少「民族性」的相關敘述。整體來看，通篇不少看似尊重臺灣人立場的善意描寫。首先，在〈臺灣的居民〉一節，後藤介紹「本島人」的人口在居民全體360多萬裡占去340萬，「本島人」之語是在臺「內地人」所使用的稱呼，由「內地人」的角度來看，也可喚作「臺灣人」，但由於會被誤認成「蕃人」，因此以「本島人」相稱為宜。他又指出日本文部省教科書稱臺灣人為「土人」，但由於會被理解成有如「北海道士人」或「樺太土人」般「低級」或「野蠻人」之意，認為「這亦是本島人甚感困擾的用語」。這裡所謂的「本島人」，後藤指的是「原本來自支那的人們，即所謂漢民族出身」。若加細分，可分為「閩族」、「粵族」，「閩

⁸¹ 後藤朝太郎，《現在的臺灣》，頁9-11。

⁸² 後藤朝太郎，《現在的臺灣》，頁11-21。

⁸³ 有關近代日本臺灣原住民組團赴內地觀光，以及博覽會展示臺灣的相關研究，中文著作可參見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臺北：博揚出版社，2005年）；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日文部分則有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松田京子，《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台湾原住民》（東京：有志舎，2014年）。

⁸⁴ 後藤朝太郎，《現在的臺灣》，頁24-28。

族」「原本是來自福建省，即以廈門為中心，包括泉州、漳州一帶的人們」；「粵族」即「所謂客人，來自廣東」。接著陳述兩個種族在臺灣的分布地區、雙方語言無法相通、「閩族」人口語言優勢等狀況。⁸⁵此外，該章也有介紹臺灣的風景、住居、衣裳、裝飾各節。⁸⁶例如臺灣家屋的建築形式，後藤也為一般「內地人」覺得怪異，但他所認為是「優點」的特色發聲，主張臺灣市街家屋建築與街道格局和氣候相以調和，內地的建築形式不適合臺灣等等。⁸⁷

有關臺灣人的性質，後藤主張這是宣傳臺灣上最重要的問題，同時兩種民族性質的彼此瞭解亦是未來相互提攜的根本。⁸⁸他說明「本島人」可分為「廣東人」和「福建人」兩族，皆性質優良且愛好和平，然而比較兩族可以發現：「福建人」溫良親切；「廣東人」則富於廉恥，兼具俠氣和性急特質。「福建人」還有迂迴曲折，多情趣且多辭令的面向。⁸⁹後藤進而比較臺灣人和日本人如下：

整體看來，廣東、福建兩族皆較內地人悠哉，具大陸氣質。而且，擁有甚為勤勉的特性。內地人動輒器量狹隘且缺乏大陸氣質，如此許多人都會被本島人看穿心思。此乃咎於內地人性急的特點，以及原本的島國生活，而自然生出此一結果。⁹⁰

後藤描述臺灣人的性質是豪放、不瞻前顧後，然就結果來講常非妄斷。又謂許多臺灣人長於「自我經濟之道」，「內地人」「看待金錢過於淡泊」，臺灣人「執拗且小心翼翼」，雖時而顯現輕佻態度，卻不致過度熱衷，不會違背自我經濟之大本。「內地人」為展現慷慨，常違反理智不惜損失；臺灣人則縱使說得大方，不少人在緊要關頭時卻反而小氣。這雖是無論內地或本島的人之常情，但臺灣人在辭令話術方面卻是更加徹底。⁹¹

後藤具體舉例臺灣人如何長於「自我經濟之道」時，以臺灣人的家族財產觀

⁸⁵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27-30。

⁸⁶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33。

⁸⁷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58-63。

⁸⁸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80-81。

⁸⁹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80-81。

⁹⁰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82。

⁹¹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82-84。

為例，指出與內地多由長男繼承家業不同，臺灣人貫徹許多男子皆能取得財產的觀念，通常會平分財產，惟亦容易引起紛爭。貯藏財物、納妾亦為傳統慣習，不時增添紛擾。但後藤話鋒一轉，又指出臺灣的家族較內地更為龐大，資產狀態平均且寬裕，加之臺灣人又有豪邁不拘小節的氣度，方能在南洋方面成就扭轉乾坤的偉大事業，「內地人」要與「支那民族」合作，應與臺灣人串連方能達致其功。在瞭解到臺灣人的這些性質時，「內地人」應如何因勢利導，是應大加考究的問題，關鍵在於予以信任。⁹² 詳如後述，好似在呼應當時總督府的「南進」政策般，後藤將臺灣人的未來連結到與內地人「內地人」合作在「南支南洋」發展上。

大體而言，後藤在該書展現的臺灣人觀，幾乎都是看似讚美、尊重臺灣人的善意描寫。不過，在批判臺灣人時，也會套用「支那民族」的視角。有關臺灣人的飲食風習，他指出臺灣人和「支那人」同樣重視飲食，其豐富程度優於漫不經心的「內地人」；然而「支那民族」對於飲食的極度堅持，將妨害國民的活動力，陷入遲滯，導向消極主義，阻礙國家進步。他提醒應留意這樣的習慣也移入到臺灣，臺灣的飲食應更加簡化，方有益於臺灣將來的發展。⁹³ 如此，在善意的大前提下，雖然也有一些冷眼批評之辭，惟終歸善意之語調。

該書屬於宣傳類讀物，文字易讀、引例淺顯，並無過度深入、抽象的思想觀察或性格剖析，惟仍可看出後藤的臺灣人觀不出時下日本視角的「支那民族」認識框架，後藤亦自信這樣的視角是他能妥切掌握臺灣人特質的關鍵。

並且，或許是由於其「善意」意圖，或為宣傳故，有關對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和日臺民族關係有不良影響的部分，則顯現出刻意迴避的傾向。例如該書宗教一章述及西來庵時有這段敘述「總之該庵新建落成時，發生了一起事件。現時不宜談論其事，要言之，過去也曾一度有利用如斯齋教寺院，無學之徒動輒行不穩之舉的時代。然而，今日若是在如此利用這些齋教寺院，毋寧會玷污本島人的名譽，有識之士間正向其訴求自重之心，漸步地戒慎此等無教育者的妄動」。⁹⁴ 敘

⁹²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84-86。

⁹³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74-75。

⁹⁴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335-336。

述雖然曖昧，推知應指西來庵事件。

（三）與「支那民族」發源地：中華民國之比較

該書亦有和對岸中國大陸（即中華民國）相較的部分，由後藤陳述「支那」當地居民的狀態可知，即便同為「支那民族」，發源地並無中流社會，大部分人口皆為苦力等下流階層，甬論乞丐。大多勞動人口沒有住家，在各處建物遊蕩休息；反之臺灣這邊則過著頗為高尚的生活。⁹⁵ 此外，有關臺灣人的日本化，後藤評價稱若觀察內地的「支那」留學生，縱使穿著和服，其身影姿態亦有大陸風情，而臺灣人留學生則更顯時尚，那是因為他們懂得內地語言，也多少瞭解「內地人」的心情。另一方面，若看在臺臺人穿著內地和服，則尚未褪去生澀，令人感覺可愛。⁹⁶ 總而言之，在其敘事裡可以看到臺灣人作為「支那民族」沾染日本的文明化，較「支那民族」發源地的中國人更加優越的一個認識格局。如此，他對於臺灣人的評價也是基於與中國人的比較來陳述，日本化、文明化就是評價的基準，可以看到身為日本人是高處俯瞰視角，凝視臺灣人的帝國意識。

除了人民之外，後藤在談論臺灣硬體、制度方面進步時，比較對象也是中華民國。他自陳周遊臺灣各地，在與「本島人」家庭、留學生家長等交流的過程中，獲致了對於臺灣進步的看法。具體上是以交通狀況、銀行設置、治安改善為例，陳述這些進步應能讓臺灣人感到幸福。談論臺灣人過去的話題，正適用於當今的中華民國，他強調「長江沿岸的中華民國人真是令人同情，我深刻感覺到住在臺灣的本島人生活安全又幸福」。詳如下列，是他想要告訴所有臺灣人的訊息。⁹⁷

首先，在教育方面，後藤謂臺灣與內地相比雖有不足，但若和中華民國的現狀相較，「實有隔世之感」。可惜部分臺灣人仍未能充分瞭解當局真意，「某些本島人出於自身利益盤算，曲解當局者用意，咎於平時偏見漸生疑心暗鬼之念，終至高唱實不存在的壓迫，聲言吾人已不堪臺灣生活」，而欲歸化中華民國。後藤批評：「我認為這就有如夏蟲撲火之屬，自甘投身社會秩序不得安寧的民國漩

⁹⁵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31-32。

⁹⁶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40。

⁹⁷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16-119。

渦中，吾人真為有此無謀舉動之人感到同情。」⁹⁸ 他又指出衛生方面與中華民國的差異最為顯著，並以後藤新平所推動的科學式研究調查為例，述及有臺灣人指稱這是「內地人」對待臺灣人有如動物，是出於要讓臺灣人滅絕之目的，殊不知這實為圖全體臺灣人幸福的事業。⁹⁹ 至於經濟狀態方面，後藤朝太郎盛讚臺灣較中華民國更為優越，環顧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臺灣的經濟獨立也屬罕見個案。他說明中華民國的稅收由地方督軍獨占，社會整體安寧秩序不得保持，在支那逗留的旅人常不堪不安和寂寥之念，在臺灣時卻不生此慮。¹⁰⁰

如此，後藤比較臺灣和中華民國的現狀，力陳臺灣之幸福，指出部分臺灣人「縱然事物狀態已有如斯改善，仍以得隴望蜀的筆法，要求制度比照「內地人」在內地各府縣的自治待遇」，他認為臺灣人如此要求是「浮現於社會生活上的一種不平」。¹⁰¹ 他歸因其不平來由如下：

據說日本在過去士農工商之社會區隔尚且繁雜的時代，國家的財富亦是由商人，或是從事工業的人們所構築，國家大本則在於農，農民即為其根本、基礎。儘管如此，農工商三者仍經常遭士以輕蔑眼光看待，以市井小民和鄉野農人的話語來說，事實上這就好像不由分說地遭到武士階級「格殺勿論」般。如今國家觀念已經普及，盛衰大受工業、商業左右，儘管這個情勢已經分明，然而傳統藐視市井小民的觀念依然在官吏社會揮之不去。近來事業家的地位大有提昇，世間對實業家的態度，頗能抱持尊敬之心來相待，但在開國甫達五十年的今天，仍存在差別之念。慮及於此來思考本島人之不平，臺灣在領有以來二十有六年的今日，本島人尚且遭到差別待遇，自稱臺灣人便遭以生蕃相待，叫人不禁同情，亦難期望這般餘風能夠立即摒除。要言之，此時此刻與其細數如斯不平，重要的是依靠臺灣本島人本身的持續努力，提昇自我地位。若是所有的本島人不致力於日益加深對內地人的信用，豈非無法去除其不平？只知要求，細數不平，而忘卻了自身應持續、勵行、努力，實令人困擾。若能進而改善臺灣的社會狀態，自發性地維護社會秩序，主動提

⁹⁸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20-123。

⁹⁹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23-125。

¹⁰⁰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25-127。

¹⁰¹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27-128。

昇臺灣的衛生狀態，積極運用國語，各方面的總體努力若能如此匯於一
致，我認為自身不平的根源便能自然去除。¹⁰²

由此可知，後藤在行文上有承認「支那民族」的大前提，又積極評價臺灣人是優秀的「支那民族」。追探其因乃是將臺灣與中華民國現狀相較，認為臺灣能有今日皆拜日本統治所賜，主張臺灣人應該信賴日本人。由此可知，《現在的臺灣》的宣傳對象，不僅針對外國人或日本人，也包括臺灣人。如後所述，不妨推想這樣的臺灣人觀裡頭，其實潛藏著對於臺灣人主體能動性的否定，這在後藤與留學生的互動中尤其顯現而出。

（四）對於臺灣人的展望及其侷限

關於臺灣的未來，後藤朝太郎在《現在的臺灣》一書裡對留學生寄予期待。他敘述臺灣人之間雖有當局妨害臺人留學內地的「流言」，惟「全屬誤解」，當局的用意在於「勿使劣質分子上京。……該般人等不應上京，該留在臺灣勉學，以在臺所受教育開發臺灣為宜。優秀人材應積極來內地留學，行有餘力者則前往歐美大學，探究學理的深蘊亦佳」。¹⁰³ 現有600多名在內地「留學」的學生，他表示「若是可行，期盼傑出人才漸由此出，為臺灣、為國家更加貢獻」，臺灣人當中亦有進入帝國大學就讀、畢業者而大受矚目。他總結「留學生雖稱不上悉屬精銳。然而，留學生當中存在……有為青年，值得為臺灣教育的未來祝福；與此同時，我欲期待他們今後更上一層的活躍」。後藤在此特別點名前景可期的留學生有林猶龍（霧峰林家，林獻堂之子）、林攀龍（同前）、王祥麟、林崇智（板橋林家）、林履信（同前），以及黃土水。¹⁰⁴ 對於臺灣留學生的期待，應該也部分來自擔任高砂寮寮長的自負，這由其呼籲日本人應徹底瞭解臺灣人性格的字裡行間亦可窺知。另一方面，後藤的臺灣人觀，在承認「支那民族」優點的同時，其實甚為固著、刻板。這樣的認知，亦可解釋成一種由上而下的目光，認定臺灣人內在的「支那民族性」不會發生變化，甚或是不該發生變化。

此外，這樣一個對於臺人族群性的刻板認知，也限制了對於臺灣人發展路途

¹⁰²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29-130。

¹⁰³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131-132。

¹⁰⁴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316-319。

的想像。後藤在書中安排了一章詳述「南支」、「南洋」各地概況，以及臺灣在經營上可發揮的作用。¹⁰⁵ 總的來說，這與後藤在前文主張重視南支南洋經營，強調臺灣人性格和家族制度的優勢，同時也呼籲日本人不應以侮蔑眼光看待臺灣人，應該在徹底了解臺灣人的性質後，致力於指導他們的說法相呼應。¹⁰⁶

1910年代到1920年代期間，日本的政治、經濟力量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帶動，得以在鄰近範圍進行擴張，這使得日本的「南進論」由明治時期的「觀念南進」進入到大正時期的「經濟南進」階段。¹⁰⁷ 不只內地，殖民地臺灣也在此段時期興起了「南洋進出熱」。臺灣人口多系出華南，而華南文化也是南洋的華僑文化，由此觀點出發，1915年南洋協會成立並長期獲得臺灣總督府經費補助，總督府本身亦在1919年設置外事課與調查課，更廣泛地進行南支南洋方面的調查。¹⁰⁸ 後藤「南支南洋應是臺灣人活躍的舞臺」的一個臺灣人觀，與日本殖民當局對於殖民地臺灣可輔助、投入南洋經營的期待一致。另一方面，在其觀點裡，日本人應該理解臺灣人性質，並加以指導；臺灣人則宜在遵循日本人指導前提上發揮自身「支那民族性」的論調，亦有所凸顯。

筆者曾在以日本治臺初期公學校「修身」教育為例的研究裡，指出當時日籍教師討論如何在臺灣人民族性與日本人有異的前提下推行「修身」教育時，常見以「利己主義」、「缺乏政治機能」、「無國家觀念」等負面特質歸納臺灣人「支那民族性」的傾向；反之，亦有「社會強韌」、「實利主義」等尚存「因勢利導」因素的正面觀察，可謂是「支那民族性」視角的正反兩面。¹⁰⁹ 根據大修館書店出版、漢學家諸橋轍次主編，世界最大規模的漢和辭典《大漢和辭典》上所收錄的辭條定義，「利己」指的是「為自身利益打算」、「利己的」意為「只

¹⁰⁵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352-365。

¹⁰⁶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頁86-88。

¹⁰⁷ 鍾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年），頁2065。

¹⁰⁸ 河原林直人，〈帝国日本の越境する社会の人脈・南洋協会という鏡〉，收入淺野豊美編，《南洋群島と帝国・国際秩序》（東京：慈學社，2007年），頁99-101。

¹⁰⁹ 參見周俊宇，〈日本統治初期台湾における公学校日本人教員の台湾人認識——『台湾教育会雑誌』における修身教育論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第23號（2021年3月），頁76-98。

為自身一人利益打算的傾向、行為」，而「利己主義」則是「以追求自身一人幸福為人生目的的主義。又作自愛主義，為利他主義之反義。」¹¹⁰「實利」的定義為「實際的利益、實際的效用」，而「實利主義」則是「以實利為標準立論處事的主義。又作現實主義。」¹¹¹綜上可知，「利己」與「利他」間乍看雖然矛盾，但如為「實利」特質之發現，則可由「利他」可最大程度滿足「利己」需求的邏輯，推衍到臺灣人在日本帝國指導下可發揮特性，達到民族最大幸福的一個結論。

後藤的「臺灣人觀」顯然是偏向後者即正面評價。然而，即使是正面觀察，依然是侷限於「支那民族性」認識框架的一種「本質」（本來的形貌、根本的性質、實質）¹¹²主義式的視角。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同樣存在著與其「中國人觀」同樣的癥結，也就是否定其觀察對象「可變」（可能變化、可以改變），縱使其眼光充滿「善意」。由下一節所述，發生於1920年代初東京臺人留學生的政治運動，便能窺見後藤與臺灣知識分子間在「臺灣人觀」上的齟齬。

陸、後藤對臺人子弟的期待和離任寮長

以上，本文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刊登報導，以及《現在的臺灣》一書內容，探討了後藤朝太郎有關臺灣的活動和言論。可以注意到，在後藤的「臺灣人觀」裡，留學生的角色甚為吃重。後藤自學生時代開始就和清國人交遊，對中國文化抱持興趣，又藉由高砂寮寮長身分，得以和許多臺灣留學生及其家長交流。身為寮長，後藤在被問及在京留學生狀況時，曾述：「儘可能將留學生引導至實業方面的方針，正穩步地往良善方向發展；雖時不無有思想上必須留意者，惟屬極其少數。」¹¹³這恐怕可以說是後藤透過自身的經驗，自負能夠充分理解臺

¹¹⁰ 諸橋轍次主編，《大漢和辭典》，第2卷（東京：大修館書店，1986年修訂版），頁244。

¹¹¹ 諸橋轍次主編，《大漢和辭典》，第3卷（東京：大修館書店，1986年修訂版），頁1093。

¹¹² 諸橋轍次主編，《大漢和辭典》，第6卷（東京：大修館書店，1987年修訂版），頁30。

¹¹³ 〈在京留學生近況 後藤朝太郎氏談〉，《臺日》，1915年7月29日，版7。

灣人，尤其是留學生們，因而自信能較一般日本人和統治當局以客觀的眼光來看待。

另一方面，由於高砂寮是統治當局經營的設施，也兼具監督入寮留學生的功能。後藤認為，臺灣留學生素來的品行較中國留學生和朝鮮留學生更加出色，且熱衷於學習，但「往往將監督所親切的關照曲解為束縛，或是干涉之意，造成宿舍方面的困擾」，並且寮生有「偷聽人交談，或是講悄悄話等癖好」，據聞他們總是想著「內地人為何要如此干涉我們」。¹¹⁴ 由此可知臺灣留學生受到監督的狀況。

1910年代後期，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勢而言，日本透過臺灣統治開始自我宣傳本國具有列強資格，同時隨著時代的嬗變，許多在京臺灣留學生開始參與政治運動。當時的臺灣社會由於教育的普及和殖產興業的發達而起變化，語言、風俗、習慣自不待言，臺灣人的心理狀態亦有所轉變。這個時期雖由於總督府開發政策而導致間歇性的武裝起義，惟整體而言是武裝抗日步入尾聲的時期，不少臺灣人習得內地近代化教育和臣民意識的同時；又有部分臺灣資產家和新式教育菁英，接受了民族自決的思想潮流，起意追求臺人民族權益的政治運動胎動期。這個動向正是以在京臺人留學生為中心而開始的，1918年成立的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1919年成立的啓發會、1920年成立的新民會，或是高砂青年會改組為臺灣青年會等等，皆是這個時期留學生的新動態。而高砂寮正是分屬各大學的在京臺灣留學生、訪日臺灣人士，以及以基督教徒為中心的日本人相遇邂逅的場所。¹¹⁵

那麼，對於這個時期留學生的動態，後藤是如何看待的呢？有關於此，在1920年8月《臺灣青年》創刊之際——正逢《現在的臺灣》刊行的半個月後——，後藤受居住在高砂寮的蔡培火和彭華英之託，以〈為臺灣文化而言〉為題，用和文和漢文兩種語文發表文字。¹¹⁶ 在這篇文章裡，後藤寫道自己被居住

¹¹⁴ 〈高砂寮の近況 本島人の東京留學生は何んな生活をして居る〉，《臺日》，1915年4月20日，版3。

¹¹⁵ 橫路啓子，〈雜誌『台灣青年』重層的なネットワークからの成り立ち〉，《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創刊號（2014年6月），頁166-167。

¹¹⁶ 後藤朝太郎，〈為臺灣文化而言〉，《臺灣青年》，第1卷第2號（東京，1920年8月），

在臺灣的「內地人」喚作「硯之後藤」（筆者按：形容其喜好硯材礦石之意），臺灣人則稱他「高砂寮長」，而後面這個稱號較前者更叫人滿意云云，自認與臺灣的淵源極其光榮，他從學生時代就喜愛「中華青年」，經常交遊；又述「自與臺灣青年關係以來，吾願實足、殆有獲民國青年與臺灣青年于兩手之概矣」。此外，在硯石和學寮外，又自認從事臺灣文化的研究，主張「臺灣之文化務須研究之比諸中華文化較深，並計其發達為要」，並舉臺灣文化近年在臺灣統治當局主導下有所進展為例，加以強調。¹¹⁷

有關臺灣留學生的特徵，後藤有「於言論則勝於內地學生數籌，其思想也闊達，其舌鋒利於劍者甚多，加之當其有所要求之際，則其態度能變若處女別現一種異常之性格，尤為有趣者也」的敘述。臺灣文化的推動有待臺灣青年的向上提昇，以達完美成就，那是因為「文物者固屬重要，人物問題尤居第一」。因此他期待臺灣青年之處甚多。後藤述：「觀夫臺灣青年，殊富有特色，對於考究臺灣文化而言，最有興趣。」¹¹⁸ 只是，所謂「臺灣文化」的內涵究竟為何？後藤語焉不詳，在文中終未具體闡明。不過，由他認為留學生在內地所學的醫、農、商、工等實學，皆應為了提昇臺灣文化和開發利權而有的見解來看，¹¹⁹ 後藤的期許還是在於實業，並不希望臺灣留學生從事學習本務或實業以外的學問或事業。

然而，從1920年末到1921年，在京臺灣留學生圈內，發生了一場就身處監督立場的後藤而言並不樂見的「騷動」，那就是1921年的第一次臺灣議會請願署名運動。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以日文漢文文體撰寫的日記中，四處可見針對當時臺灣學生各種動向的紀錄。從摘述部分可知，後藤和晴山庸三一同於1921年1月18日面見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田總督日記裡有「後藤朝太郎、晴山庸三來報在京臺灣學生之近況，又述關高砂寮改善意見。則詳示臺灣教育之方針，命遵守其旨

頁12-15；後藤朝太郎，〈臺灣文化のために〉，《臺灣青年》，第1卷第2號（東京，1920年8月），頁12-16。惟漢文版與日文版的用字遣詞稍有差異，如日文版中的「支那」在漢文版中一律代換為「中華」，推測漢文版可能為蔡培火、彭華英等臺灣留學生所翻譯。以下引述文字，在比對漢文版與日文版無文意出入的前提下，皆引自漢文版。

¹¹⁷ 後藤朝太郎，〈為臺灣文化而言〉，《臺灣青年》，第1卷第2號，頁12-13。

¹¹⁸ 後藤朝太郎，〈為臺灣文化而言〉，《臺灣青年》，第1卷第2號，頁13。

¹¹⁹ 後藤朝太郎，〈為臺灣文化而言〉，《臺灣青年》，第1卷第2號，頁14-15。

趣。」敘述。¹²⁰ 3月26日的日記則記載：

下村長官每年以春期開筵招臺灣學生數百人，以為恒例。今期以不在之故，鼓參事官等代行之，開園遊會於藤山雷太庭園，期以本日招小學生及女生徒，以明日招青年學生，既整準備。然昨日林獻堂召集在京臺灣學生于明治大學，行關臺灣議會請願報告之後，議決招待不應之事，使學生數人要女生徒等來園者于途中不得來會，園遊會之設備全然歸于水泡。彼等之輕舉妄動、不解事體，可憎亦可憐也。¹²¹

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順每年3月上京赴帝國議會備詢之便，設宴款待臺灣留學生，兼求訓示之效，已是慣例，然而1921年留學生卻因推行議會運動而抵制殖民當局的宴請。¹²² 田健治郎在3月27日這天的日記上記載：關於這場「騷動」，「後藤朝太郎來謝對臺灣學生監督不行屆」¹²³之語。3月28日日記裡有：「朝，蔡培火來辨〔辯〕疏一昨日下午村長官園遊會缺席之事由。然其言皆粉飾，不足取也」文字。¹²⁴ 3月30日日記中有：「永田秀太〔次〕郎來謝臺灣學生不穩舉動之輕舉，且述關將來高砂寮經營方法及對臺灣學生保護監督之意見。予又答所見，囑改善方法調查之事」敘述。¹²⁵

由於這場騷動，總督府以「臺灣學生間近來似有抱持不當思想者，或為改造運動，或以宿舍學生之決議，不僅不從當局之命，反採取違反當局意志之行動，

¹²⁰ 〈田健治郎日記〉，1921年1月18日，收入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年），頁19。「生徒」為「高、中學生」之意，「歸于水泡」意指「苦心終歸白費、泡湯」。

¹²¹ 〈田健治郎日記〉，1921年3月26日，收入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105。

¹²² 圍繞著這場宴會，臺灣政治史學者陳翠蓮從在京臺人知識菁英的角度，留下了生動的描寫。參見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第1卷：自治的夢想（臺北：衛城出版，2013年），頁14-30。

¹²³ 〈田健治郎日記〉，1921年3月27日，收入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107。「謝」為「謝罪、道歉」之意，「行屆」意指「徹底、周到」。

¹²⁴ 〈田健治郎日記〉，1921年3月28日，收入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108。蔡培火為在京臺人學生運動領導人物。

¹²⁵ 〈田健治郎日記〉，1921年3月30日，收入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110。永田秀次郎為東洋協會理事。

甚而對當局搬弄不穩言辭者」為由，「善良學生雖令人同情，但該等不用功認真的分子無反省跡象」，斷然關閉宿舍。¹²⁶ 臺灣人學生一度遭令全數返臺，¹²⁷ 6月13日後藤在東洋協會總會上報告關閉情形，如學生狀況、總督府意向等。學生監督事務等也決定由東洋協會承接。¹²⁸

後續的報導指出，後藤盼能考察支那，於8月4日由東京出發。¹²⁹ 在田健治郎8月28日的日記中記載：「朝，高砂寮監督囑托佐藤寅太郎代議士來訪，述關同寮經營之意見及希望。予告從來之經過，指示將來監督之方針。」¹³⁰ 事實上，後藤的遠行與這場留學生風波和當局人事革新的方針不無關係，報載高砂寮寮長撤換，其繼任者由佐藤寅太郎兼任，並確定了自9月1日起重新開啟的方針。¹³¹



柒、1920年代言論中的臺灣人觀

後藤朝太郎雖然處在近似殖民統治當局的立場，惟由其言論可知，他經常出於自身的學問和經歷等，抱持介於統治當局和被殖民者，以及內地或在臺日本人社會間的第三人意識，

圖5、1923年拓殖大學畢業紀念冊中的後藤朝太郎肖像

資料來源：翻製自日本拓殖大學檔案事業室所藏數位資料，無檔號。

¹²⁶ 〈高砂寮閉鎖決定〉，《臺日》，1921年6月7日，版2。

¹²⁷ 〈高砂寮九月再開〉，《臺日》，1921年8月10日，版5。

¹²⁸ 〈協議高砂寮問題〉，《臺日》，1921年6月17日，版9。亦請參見紀旭峰，《大正期台灣人の「日本留学」研究》，頁143。

¹²⁹ 〈後藤氏の渡支〉，《臺日》，1921年8月6日，版2。

¹³⁰ 〈田健治郎日記〉，1921年8月28日，收入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294。佐藤寅太郎為出身長野縣的教育家、政治家，時任朝鮮學生監督。

¹³¹ 〈一時閉鎖した高砂寮は九月から新寮長の佐藤寅太郎氏を迎へて再び開寮するので寮の氣風も一変するであらう〉，《臺日》，1921年8月8日，版5。

自信能以客觀眼光來理解臺灣。在其描述臺灣，充滿善意的文字和言論裡，反覆向內地的日本人主張：臺灣不是野蠻之地，島上人口居多數之臺灣人是優秀的「漢／支那」民族，且在日本統治下過著進步的生活。為了傳達臺灣的進步，日本有關單位必須講求宣傳之法；而臺灣人對於自身處在進步統治下的處境，亦須有所體認。上述論點在後藤離開高砂寮職位後的1920年代，亦持續主張。¹³² 本節擬彙整後藤在《現在的臺灣》出版，以及辭去高砂寮寮長一職後發表的言論，持續考察其臺灣人觀。

1922年3月，時任東洋協會大學教授の後藤，於該校期刊《東洋》的特輯「民族研究號」（參見圖6）中，發表題為〈支那臺灣朝鮮的民族性比較〉（〈支那臺灣朝鮮の民族性比較〉）的論說文（參見圖6）。該文主旨在比較支那、臺灣、朝鮮三民族的性格，本文將特別聚焦於敘述臺灣人的部分。文章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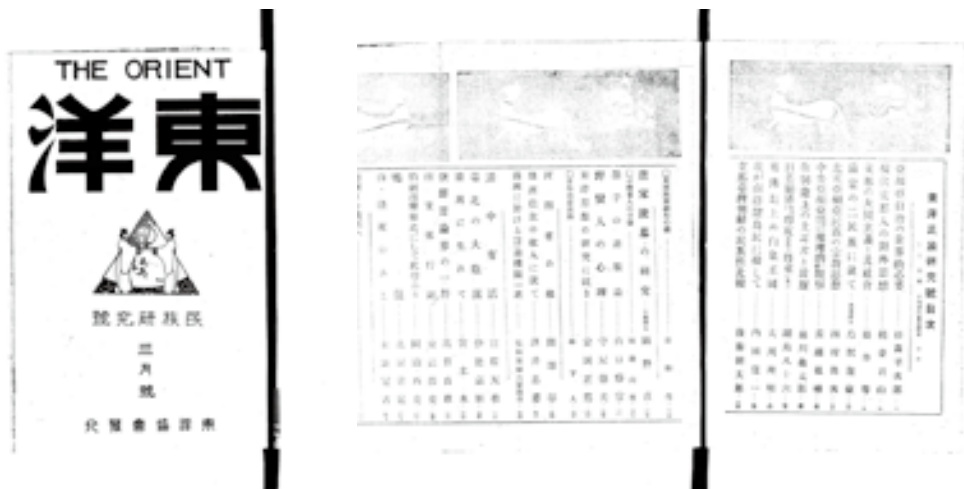


圖6、《東洋》「民族研究號」（1922年3月）書名頁、目次頁

資料來源：翻製自日本拓殖大學檔案事業室所藏數位資料，無檔號。

頭，仍是明白揭示臺灣「只談論不過七、八萬左右的生蕃特性，而略去臺灣三百五十萬支那族（臺灣本島人）的特質，此為吾人所不能忍受者」，他認為與臺灣

¹³² 後藤朝太郎，〈南支及び臺灣を諒解せしむる民眾の方法〉，《臺日》，1923年7月18日，版3。

原住民相較，身為「支那民族」的臺灣人更是臺灣居民的主體，後者更應受到矚目。

至此，經常意識到臺灣人是「支那民族」的後藤，在論及中國大陸的「支那民族性」時，指出其中「可明顯發現者」，有下列各點：

- ①「有持久力」
- ②「有包容力」
- ③「有同化力」
- ④「擅長自我自己生存之道」
- ⑤「情緒、態度驟變」
- ⑥「好算計，對利益敏銳」
- ⑦「性好和平」
- ⑧「時而顯露殘忍特質」
- ⑨「在形式上論議體面論」
- ⑩「著重過程，更甚結論」
- ⑪「時有雷同性」
- ⑫「總是迂迴曲折，興趣甚多」¹³³

在列舉上述特點之後，後藤並未針對各個項目深論，無法得知他的這些論點是如何觀察而來，有些敘述甚至不知所云，惟仍可視為其觀察臺灣人的一個框架。有關臺灣人的民族性，他指出「如論支那的民族性，則臺灣情事不言可喻」；另一方面，後藤提及過去自己與「臺灣學生」的談話，他曾對這些學生談「支那民族性的片面」，臺灣學生卻顯露出「有些不滿意的態度，謂支那亦應有優點，欲聽聞此部分」的看法。不過，當這些人到中國去旅行，就能體會到臺灣在衛生、教育、交通、安全、社會等方面的文明皆較進步，於是自己對於「支那民族性」的論點「方有公正評斷」。

然而，「若說他們是否就此滿足？則非如此」。後藤指出臺灣學生盡是談些「自治問題」或「臺灣議會問題」之話題，「談論的內容缺乏通融性，既無趣又

¹³³ 後藤朝太郎，〈支那臺灣朝鮮の民族性比較〉，《東洋》，大正11年3月號（東京，1922年3月），頁105。

令人不舒坦」，他認為「用這些事物來談論臺灣本島人的民族性，無助於臺灣人」。後藤認為臺灣人的民族性是「與政治或討論性事項相較，在嗜好、享樂方面較為出色」，臺灣的音樂、餐食、遊戲、祭祀方面皆有特色。後藤於此意識到臺人政治運動菁英的角色與言論，用稍顯冷淡的筆調寫下：「他們未來或將成為雄辯家」的評語。末尾並表明如下期待，指出今後應「介紹其享樂心情的各色底片」，以為「內地人之臺灣教育資料」、「臺灣文化之宣傳」，甚至是「介紹臺灣民族性優點之法」，期待臺灣官民的努力。¹³⁴

意味深長且更值得矚目者，是該雜誌的〈編輯後記〉提及由後藤朝太郎撰寫〈支那臺灣朝鮮的民族性比較〉一文的來龍去脈。該專欄提及，有關臺灣和朝鮮的民族，本應委託出身該地的人士撰寫，但由於「種種障礙終至無法實現」。有關原因，該文敘述如下：

這是因為臺灣人方面，雖有本刊認為適任的三四位青年，並嘗試請託，惟皆由於鄉黨規矩或同學牽制等因，以無法發表自身意見於雜誌為理由而不願執筆……。¹³⁵

由此可知，該雜誌認為東京臺灣留學生在推動議會運動的政治氣氛下，縱想表達不同意見，也會因周遭氛圍而無法如意。然而，本文在論及朝鮮時，卻出現相反的邏輯：

而朝鮮人這方，雖特意寫成並交稿，然徹頭徹尾皆在攻擊日本、攻擊總督府，沒有任何我們所預期的，有關朝鮮民族的見解。是以雖然遺憾仍決定不予採用。¹³⁶

這樣的前後轉折，明白顯露出縱使臺灣人自行吐露真實心聲，只要非屬東洋協會的「預期」文字，終將遭受和朝鮮人同樣的批判。如下所述，對於兩民族的邏輯乍見矛盾，但東洋協會所代表的，所謂促進殖民地宣傳和相互理解的官方立場團體本質，正顯露於此：

¹³⁴ 後藤朝太郎，〈支那臺灣朝鮮の民族性比較〉，《東洋》，大正11年3月號，頁108-111。

¹³⁵ 〈編輯後〉，《東洋》，大正11年3月號，頁249。

¹³⁶ 〈編輯後〉，《東洋》，大正11年3月號，頁249。

吾人對臺灣青年畏懼鄉黨，不能暢所欲言的卑屈無力感到愕然；那些朝鮮學生無法平靜從容研究、省察自身民族，動筆開口便立刻、一貫攻擊日本的那種自以為是、乖僻彆扭的品性，亦令人吃驚。如此態度能從事甚麼維新改革呢？臺灣人也好，朝鮮人也行，接觸過些許新學問、新思想的小伙子，若是如此無力、不省，那麼他們的前途如何，將可想而知。

我們特地為朝鮮、為臺灣著想而發起的這樣一個企畫，就因為他們缺乏認識，而全部泡湯了。誠屬遺憾，無法可想。¹³⁷

雜誌《東洋》編輯後記對臺灣人和朝鮮人兩民族的批判、指摘，實在嚴厲，對照後藤欲為臺灣人發聲的文字，經常顯露不應關注政治或反抗方面的傾向，對於臺人政治運動不欲正面以對的背後，正存在著上述因素。不難想像當時在京留學的知識分子與位居監督立場的殖民關係人士間存在的緊張關係。

不過，在1920年代，後藤對於臺灣人的政治運動仍保有聯繫。1924年6月29日第五次請願運動時，日本植民通信社曾以「有令內地有識之士普遍理解該運動旨趣，取得認同之必要」為由，在帝國飯店邀集代議士、學者、報章雜誌出版社等，安排了與蔡培火等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懇談的機會。當時後藤朝太郎以東洋協會大學教授身分，和明治大學教授泉哲、日本大學教授久門商利一同作為學者代表出席，其他出席人士還有代議士植原悅次郎和前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長竹內友治郎等。¹³⁸ 後藤收錄於雜誌《植民》中關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意見如下，整體而言雖未表示否定，仍亦保持距離：

東洋人向來抱持某種程度極為頑固的情感，嘴裡提倡親善亦全然不欲實踐，這是缺乏相互理解的根本原因，所以臺灣潛流與內地智識階級間的密切接觸最為必要。從而議會設置運動絕不易倉促成功，必須穩穩當當地推動。內地人應當放眼向外、開闊胸襟；本島人則應投注全力在喚醒內地智識階級的關注上，雙方必須如此相互讓步為是。¹³⁹

¹³⁷ 〈編輯後〉，《東洋》，大正11年3月號，頁249。

¹³⁸ 一記者，〈與へられざる自由——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懇談會の記〉，《植民》，第3卷第8號（東京，1924年8月），頁94-95。

¹³⁹ 一記者，〈與へられざる自由——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懇談會の記〉，《植民》，第3卷第8

終1920年代，後藤仍經常在《臺灣日日新報》投稿遊歷文字，介紹他地風土民情，時與臺灣相較，或發議行文談臺灣定位。細緻考察宜另起一文，以下專就本文主旨，姑舉數例說明。後藤於1925年接受《臺灣日日新報》的邀請再度訪臺，在該報總社所舉辦題為「南支南洋與臺灣使命」（南支南洋と臺灣の使命）的演講會上進行演說。¹⁴⁰ 其內容日後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可歸納出下列數項重點：首先，針對應善用臺灣來理解中國的這一點，後藤鼓勵研究臺灣民族，他主張這不僅是為了更親近臺灣；在統治臺灣上，在預先研究「支那」時勢上，再無更適當之方法。日本人雖亦有在「支那」遊走的機會，惟幾乎有如飛腳旅行般，未必能充分品味民俗；就此而言，在臺灣能更有餘裕且充分地研究，方便之處亦多，所以如欲實施民俗考察，將能夠盡其所欲。¹⁴¹

如此思惟的背景裡，還有著另一重點，也就是後藤的「臺灣人觀」裡始終存在的核心思想：臺灣是「支那民族」居住地，同時其文明、文化發展又因日本統治而更加洗練，因此如今的「支那」之「美」就在臺灣。就後藤而言，臺灣作為日本帝國內部的「支那」，在「臺灣人顯為優異『支那民族』」的認知裡，併存著「支那」文化的劣質成分因日本統治消失；優點則在日本統治下保存、發揚的認識。

接著舉出能夠明白瞭解後藤這個想法的兩項事例。後藤針對在中國旅行途中時時遭遇的「土匪」，指出「即使是臺灣的蕃公（按：應指山地原住民），如今亦沐文化光輝，停止了狙擊這樣的不當行為，近來全然不再流行。惟有土匪仍搞著落伍的狙擊」。在描述中國行旅經驗時，後藤與臺灣作聯想，凸顯出此優彼劣。¹⁴² 針對孔子廟後藤也有主張：「此次我在第二十四次的支那遊歷結束後，來到臺灣並前往臺南遊歷，參拜了臺南孔子廟，見識到這真是超乎想像的雄偉廟宇」、「臺灣的孔子廟，就某種意義而言，在支那本地亦不多見。該建物極其清淨、美輪美奐，樂器用具備齊，縱令稱頌其為東洋數一數二之偉構，亦非溢美之

號，頁97-98。

¹⁴⁰ 〈後藤朝太郎氏講演會〉，《臺日》，1925年4月19日，版2。

¹⁴¹ 後藤朝太郎，〈久しぶりに臺灣民族の真面目に直面したい 曾遊の思出は數々〉，《臺日》，1925年2月14日，版3。

¹⁴² 後藤朝太郎，〈土匪より見たる支那觀〉，《臺日》，1925年2月9日夕刊，版3。

辭」。¹⁴³

在關於後藤朝太郎的既有研究裡，曾指出「中國人觀」裡存在社會觀和民眾觀，卻無國家觀。姑且不論「支那民族」有無創立或建設國家的能力，但後藤的「臺灣人觀」裡，實有臺灣的「支那」文化將在日本這個「國家」的統治下，更加昇華的邏輯。如此則可斷言後藤的「支那觀」，特別是對於政治和社會的認識，和當時日本知識界如內藤湖南等論者的中國認識終無太大差異。其筆下作為日本帝國「內在支那」的臺灣社會，或許就是日本在中國擴張計畫的一種願景寫照。

後藤所謂臺灣獨有「支那」之「美」，不僅是以日本人為對象的呼籲，也有不少部分是期盼臺灣人應與中國的現狀比較，自覺現在的臺灣是何等幸福。後藤在1925年所述福州考察之行的感想中，也呼籲臺灣人，應該關注「支那」社會、生活、經濟、衛生、教育等各種實態，正視其「可憐的狀態」，比較中國和臺灣的治績，往實業邁進，南支南洋對臺灣人而言是一個大舞臺。¹⁴⁴

而在1930年出版的《談支那民情》一書，也收錄了〈支那社會的訪察觀光從臺灣開始〉、〈久違盼睹臺灣民族之真誠〉、〈從支那看臺灣之美〉等文。這些臺灣相關的章節，構成了後藤支那文化論的一部分。¹⁴⁵ 這些文字描述臺灣人和「支那人」這些「支那民族」，「即使在政治上受到壓迫，仍以經濟和文化戰勝為政者」，又說他們擁有優異「同化力」，對於日本人則呼籲「日本民族切勿性急激進地盤算同化」。¹⁴⁶ 另一方面又力陳應宣傳日本殖民支配在臺灣所達致的「統治美果」，¹⁴⁷對臺灣人則呼籲應由與中華民國政治狀態的比較，理解臺灣的社會是如何地安定。¹⁴⁸

¹⁴³ 後藤朝太郎，〈支那より見たる臺灣の美觀（下）〉，《臺日》，1925年5月26日夕刊，版3。

¹⁴⁴ 後藤朝太郎，〈福建より見たる臺灣觀 福州視察の一事さへ實現せぬのは遺憾千萬〉，《臺日》，1925年4月23日夕刊，版3。

¹⁴⁵ 參見後藤朝太郎，《支那民情を語る》（東京：雄山閣，1930年），目次頁。

¹⁴⁶ 後藤朝太郎，《支那民情を語る》，頁516。

¹⁴⁷ 後藤朝太郎，《支那民情を語る》，頁509-514。

¹⁴⁸ 後藤朝太郎，《支那民情を語る》，頁519-521。

後藤的「臺灣人觀」在其日後龐大的「中國人觀」著作中，多大程度連結、又以何種姿態浮現？並非本文所能完整處理的範圍，惟仍可窺知其「支那民族觀」在日本、中國、臺灣三方之間呈現的「善意」，其實各存權宜意圖。

捌、結語

自日本領有臺灣以來，日本人對於臺灣人的「民族性」觀察，存在著「利己主義」或「缺乏國家觀念」等負面印象；另一方面，雖然同樣不脫「支那民族性」認識框架，亦有「實利主義」等尚存利導、運用可能性之相對正面的評價。如本文所見，在後藤朝太郎反映於《現在的臺灣》等論述的臺灣人觀裡，主張不藐視「支那民族」，應該予以評價，廣為宣傳；另一方面，呼籲臺灣人亦可善用自身特質在日本帝國發展上扮演角色，作為重視自我經濟發展的民族，接受日本人指導，在不涉入政治的原則下，透過前往南支南洋發展，為自身民族的發展，也為帝國主義的擴張做貢獻。

然而，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在1910年代成果漸舉，同時卻也是臺灣菁英在心理上對於將來展望漸見變化的時期。此一心理狀態的變化是教育普及和殖產興業發達等近代化發展下的產物。由於總督府的開發政策，這個時期雖仍發生間歇性的武裝反抗，惟整體而言抗日武裝鬥爭步入尾聲，也出現了部分和日本人受相同水準教育的新知識分子，他們受到日本和世界的政治思潮之影響，展現出欲追求臺灣人民族權益之胎動。不過，對於後藤朝太郎這樣一位抱持本質主義式觀點，意即「支那民族性」來理解臺灣人的日本人士而言，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轉型期中，在部分臺灣人先覺的心理變化中萌芽的政治行動，似乎礙難理解。如此，始於後藤有感內地對臺誤解和漠不關心而起念，大體上抱持善意的「支那民族性」正面視角，依憑這個認識方法所欲匡正的誤解，終究難免自我框限之途，仍是否定了臺灣人的主體性、能動性，與藐視終無二致。

日本社會心理學家小坂井敏晶在《所謂民族的虛構》一書分析世界各地的歷史案例指出，看似本質、真實的「人種」、「民族」的概念，是十八至十九世紀

西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意識型態的背景下被創造而出並普及，其中存在著在支配異己時，必須將他者視作根本上異質之存在的邏輯。¹⁴⁹ 區分不同民族界線的關鍵並非傳統或文化等因素，而就在於設下界線的動機與行為本身。此類動機或行為乃受變動的歷史脈絡、社會背景大大左右。這種本質性的思維是一種被創造而出的「虛構」，在帝國列強宣揚殖民正當性時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在被殖民者訴求共同體的「民族同一性」以發起反抗運動時，也扮演著重要角色。¹⁵⁰

眾所周知，1920年代臺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並非曇花一現，毋寧說往後的十多年是日本統治下臺灣人思想最為活絡、行動最為踴躍的時期。這一系列同樣由訴求「民族同一性」即臺灣人主體出發的政治思想，不僅勇於討論「臺灣人為何？」，也藉著文化啟蒙活動在臺灣社會帶動了廣泛風潮。在中國大陸，即後藤筆下的「支那」本土，雖有中華民國於1910年代成立，但政局紛擾、軍閥割據、列強角逐等，內外不安定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了1920年代。儘管如此，運動人士對心中的祖國仍熱烈關注，身為殖民階層的日本人則對中國大陸與臺灣間人事、思想、文化交流則大體特警戒態度。就本文的問題意識，也就是日本帝國將臺灣作為殖民地來統治，在帝國內部擁有「支那民族」即臺灣漢人的觀點來看，此一時期環繞日、中、臺的統治環境和國際關係產生變化，也可推知作為認識方法的「支那民族性」在進入到1920年代後，亦將發生相應變化。¹⁵¹

¹⁴⁹ 小坂井敏晶，《民族という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頁1-7。

¹⁵⁰ 小坂井敏晶，《民族という構》，頁10-16。

¹⁵¹ 更詳細的討論，參見周俊宇，〈日治時期在臺日人記者的「臺灣議會運動觀」（1920年代—1930年代初）——聚焦於「支那民族性」論辯〉，《臺灣風物》，第72卷第1期（2022年3月），頁71-122。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 〈後藤朝太郎履歷書〉。東京：拓殖大學アーカイブズ事業室藏，1922年。
〈拓殖大學卒業紀念アルバム〉。東京：拓殖大學アーカイブズ事業室藏，1923年。

二、日記、文集

- 山崎百治，《これが支那だ——支那民族性の科學的解析》。東京：栗田書店，1941年。
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年。
東洋協會調查部編纂，《大正九年 現在の臺灣》。東京：東洋協會，1920年。
後藤朝太郎，《現在の臺灣》。東京：白水社，1920年。
後藤朝太郎，《支那民情を語る》。東京：雄山閣，1930年。
笠井孝，《裏から見た支那民族性》。東京：日本外事協會，1935年。
アーサー・エチ・スミス著，澀江保譯，《支那人氣質》。東京：博文館，1896年。
Smith, Arthur Henders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1890.

三、報刊雜誌

- 《東洋》，東京，1922年。
《東洋時報》，東京，1907年。
《植民》，東京，1924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0-1925年。
《臺灣協會會報》，東京，1898年。

《臺灣青年》，東京，1920-1921年。
《讀賣新聞》，東京，1902年。

四、專書

- 人事興信所編，《人事興信錄》，上卷。東京：人事興信所，1939年版。
- 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03年。
- 小坂井敏晶，《民族という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
- 小泉欽司主編，《現代日本朝日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0年。
- 中川未來，《明治日本の国粹主義思想と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2016年。
- 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国と植民地の記憶》。東京：風響社，2016年。
- 加藤春城，《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1939年。
-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 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
- 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東洋文化協会五十年史稿——台湾・東洋協会研究》。東京：拓殖大學，2011年。
- 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
- 松田京子，《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台湾原住民》。東京：有志舎，2014年。
-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愛知：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年。
- 相田洋，《シナに魅せられた人々——シナ通列伝》。東京：研文出版，2014年。
- 紀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研究》。東京：龍溪書舎，2012年。
-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1981年。
- 渡邊利夫主編，《拓殖大学百年史 昭和前編》。東京：拓殖大學百年編纂委員

會，2011年。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年。

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第1卷：自治的夢想。臺北：衛城出版社，2013年。

鳥海靖等編，《日本近現代史事典》。東京：東京堂，1999年。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臺北：鴻儒堂，2003年。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6年增訂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臺灣の教育》。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4年。

諸橋轍次主編，《大漢和辭典》，第2、3、6卷。東京：大修館書店，1986、1987年修訂版。

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臺北：博揚出版社，2005年。

ポール・A・コーエン著，佐藤慎一譯，《知の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東京：平凡社，1988年。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三石善吉，〈後藤朝太郎と井上紅梅〉，收入竹内好、橋川文三編著，《近代日本と中国》，下卷。東京：朝日新聞社，1974年。

三谷博，〈「アジア」概念の受容と変容——地理学から地政学へ〉，收入渡邊浩、朴忠錫編，《韓国・日本・「西洋」》。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5年。

上沼八郎，〈台湾協會會報解題「台湾協會とその活動」〉，收入《台湾協會會報》，別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88年複製版。

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シズム——民衆の中国（人）觀を例に〉，《熊本大学文学部論叢》，第78號（2003年3月）。

中島隆博，〈教養としての中国——規範の鑑と蔑視の間で〉，收入苅部直等編，《岩波講座日本の思想第3巻 内と外——対外觀と自己像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2014年。

井上厚史，〈「国性爺合戦」から「漢国無体 此奴和日本」へ——江戸時代における華夷觀の変容〉，《同志社国文学》，第58號（2003年3月）。

- 石川泰成，〈後藤朝太郎の支那学の構想〉，《九州産業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第19號（2001年8月）。
- 石川泰成，〈後藤朝太郎の日中民族性比較論——ある支那通の日本人批判〉，《九州産業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第22號（2002年8月）。
- 呂慧君，〈「老上海」内山完造と「支那通」後藤朝太郎の中国認識〉，《日本文芸研究》，第64卷第2號（2013年3月）。
- 吳宏明，〈近代日本の台湾認識——『台湾協会会報』・『東洋時報』を中心に〉，收入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東京：綠蔭書房，1996年。
- 坂元ひろ子，〈多民族国家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歷程——大漢族／黃種／中華民族〉，收入青木保等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解体と再構成》。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
- 周俊宇，〈日本統治下對於臺灣「土匪」的民族性認識〉，《臺灣風物》，第70卷第3期（2020年9月）。
- 周俊宇，〈日本統治初期台湾における公学校日本人教員の台湾人認識——『台湾教育会雑誌』における修身教育論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第23號（2021年3月）。
- 周俊宇，〈日治時期在臺日人記者的「臺灣議會運動觀」（1920年代－1930年代初）——聚焦於「支那民族性」論辯〉，《臺灣風物》，第72卷第1期（2022年3月）。
- 岩崎菜子，〈訳者あとがき〉，收入アーサー・H・スミス著，石井宗皓、岩崎菜子譯，《中国人的性格》。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年。
- 河原林直人，〈帝国日本の越境する社会的人脈・南洋協会という鏡〉，收入淺野豊美編，《南洋群島と帝国・国際秩序》。東京：慈學社，2007年2月。
- 若林正丈著，許佩賢譯，〈在諸帝國周緣活下去——臺灣史中的「邊境動力」與地域主體性〉，《師大臺灣史學報》，第9期（2016年12月）。
- 馬場公彦著，林暉鈞譯，〈近代日本對中國認識中脈絡的轉換——從「支那」這個稱呼談起〉，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 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六屆討論會秘書處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2年。
- 笹沼俊曉，〈アジアの中の人文学〉，收入中野目徹編，《近代日本の思想をさ

- ぐる——研究のための15の視角》。東京：吉川弘文館，2018年。
- 劉家鑫，〈「支那通」後藤朝太郎の中国認識〉，《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4號（1997年3月）。
- 劉家鑫，〈後藤朝太郎の日中關係論——山東出兵から日中事変まで〉，《現代社会文化研究》，第11號（1998年3月）。
- 劉家鑫、李芯，〈「支那通」の中国認識の性格——後藤朝太郎と長野朗を中心に〉，《東洋史苑》，第70、71號（2008年3月）。
- 横路啓子，〈雑誌『台湾青年』重層的なネットワークからの成り立ち〉，《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創刊號（2014年6月）。
- 鍾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年。
- イ・ヨンスク，〈雜居への恐怖——近代日本の他者認識〉，《言語文化》，第23號（2006年）。

六、學位論文

-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1895-1919）〉。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年。
- 周俊宇，〈支那民族性というまなざし——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と台湾人認識〉。東京：東京大學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20年。